臺大歷史學報第26期
2000年12月，頁263~307

BIBLID1012-8514(2000)26p.263~307

# 書寫忠烈：明末夏允彝、夏完淳父子殉節故事的形成與流傳

孫慧敏*

## 提　要

夏允彝（1596~1645）與夏完淳（1631~1647）父子，是明末清初抗清運動中的兩位死難者。他們雖然出身平凡、仕宦不顯，而且也不是最「艱苦卓絕」、最「慘烈」的個案，但他們的故事，卻在其死難後的三百多年中，逐步從眾多忠烈故事裡脫穎而出。筆者認為，這與夏氏父子的同鄉後輩運用松江地區在經濟與文化上的優勢條件，來營造對夏氏父子的鄉賢崇拜有關。而夏氏父子相關文獻的彙集、刊刻與流傳，一方面使他們逐步從「鄉賢」轉化為「國殤」，另一方面也使他們的故事，有了可資依傍的基調。到了晚清，由於「少年」、「青年」族群的興起，夏氏父子的歷史地位產生明顯的消長。在這樣的時代環境下，夏完淳的「年少殉國」，被突顯為一項無與倫比的卓越特質，而他也因此而成為清末民國時期重要的青年偶像。

關鍵字：夏允彝　夏完淳　忠烈　鄉賢　少年

* 作者係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前言
二、走進歷史舞台——城市邊緣的新興士紳家庭
三、夏家親友的記述——以夏允彝為中心的故事
四、夏家故事的異傳
五、史臣的修撰
六、鄉賢與國殤：夏完淳遺稿的刊刻與流傳
七、少年的浮現：夏家故事的近代版本
八、結論

## 一、前言

夏允彝（1596~1645）與夏完淳（1631~1647）父子，都是明清之際松江府抗清運動中的死難者。他們的事蹟，除了得到明遺民的記載與傳誦之外，也被寫入了《明史》。相對於其他許多《明史》中的人物，或者靜默地躺在故紙堆中，或者只存活在專業歷史學者的心中、口中，夏氏父子的故事，特別是以夏完淳為中心的夏家故事，卻在近代中國的知識界得到不少共鳴。單就研究論文與專書來說，在一九三〇年到一九四九年間，根據筆者目前搜集所得，共有五篇與夏完淳有關的論文及兩本專書問世；[1]而在戴逸、羅明所收集的清代人物研究論文目錄

1 王志梁，《夏存古（三百年前國難期間的一個學生）》（長沙：湘鄂，1936）；聞亦博，《明代模範學生夏完淳傳記》（重慶：獨立出版社，1945）；山公，〈民族詩人夏存古〉，《中央時事周報》3 卷 42 期（1934）；侯庭督，〈民族詩人夏存古〉，《文化與教育旬刊》92 期（1936）；郭沫若，〈夏完淳之家庭師友及其殉國前後的狀況（附表）〉，《中原月刊》1 卷 2 期（1943）；南史，〈夏允彝完淳父子合傳〉，《中美週刊》1 卷 30

臺灣大學歷史學系

（1950~1986）中，則收錄了十篇以夏完淳為主題的論文及一本專書。[2]

夏氏父子為什麼能夠在近代中國重新得到書寫？沈松僑指出，這和晚清知識人投入故紙堆中找尋「抵禦外族」的「民族英雄」，以進行國族建構的運動有密切的關係。[3]國族主義的興起即使是夏氏父子的故事重

---

期（1940）；南史，〈江左少年夏完淳傳〉，《宇宙風》37~39 期（1941）。

2 戴逸、羅明，《清代人物研究》（成都：巴蜀書社，1992），470~548。在戴逸、羅明所編的研究論文索引中，以王夫之為研究主題的最多，高達一百九十餘篇；其次則是康熙皇帝，有一百三十餘篇；再次則是鄭成功的研究，有七十五篇。除了這三個人之外，其他的人物，大抵可以分成三個大類：第一大類是篇數在三十篇到五十篇之間的人物，這些人多半是明末清初著名的大思想家，至於政府大員則只有史可法一個人而已；第二大類是篇數在十篇到三十篇之間的人物，這些人大多是明末清初最重要的政治人物；至於第三類則涵括了大多數得以名留青史的人物，相關研究的篇數都在十篇以下。按照這樣的分類標準，夏完淳可以躋進第二類。（見表一）但如果我們進一步的將時間縮短到 1970 年代以前，則夏完淳被書寫的頻率，可能不下於第一類當中的許多知名的學者。（見表二）

表一：1950~1986 年間明末清初人物研究論文篇數

| 篇數 | 人名 |
|---|---|
| 150~ | 王夫之 |
| 100~149 | 清聖祖 |
| 50~99 | 鄭成功 |
| 30~49 | 黃宗羲（47）、史可法（46）、傅青主（46）、顧炎武（46）、方以智（32）…… |
| 10~29 | 李定國（24）、李自成（21）、多爾袞（18）、袁崇煥（17）、施琅（16）、唐甄（16）、夏完淳（10）…… |
| 1~9 | 張煌言（7）、洪承疇（8）…… |

表二：1950~1970 年間明末清初人物研究論文篇數

| 人名 | 黃宗羲 | 史可法 | 傅青主 | 顧炎武 | 方以智 | 李定國 | 李自成 | 多爾袞 | 袁崇煥 | 施琅 | 唐甄 | 夏完淳 |
|---|---|---|---|---|---|---|---|---|---|---|---|---|
| 篇數 | 5 | 32 | 5 | 24 | 9 | 18 | 1 | 0 | 2 | 0 | 2 | 4 |

3 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新受到注意的契機，卻無法解釋夏氏父子在夏家故事中之地位消長，也不能說明夏完淳的故事為什麼會比其他眾多明末士大夫的忠烈事蹟，更能引起近代中國知識人的注意。因此，這個現象實際上正在提醒著我們：近代中國知識階層在從事歷史書寫的時候，除了「國族主義」以外，還有許多尚未經過發掘與反省的考量與關懷。

三百五十多年來，包括夏氏父子自己、夏家的親友及後世的各種正史、野史撰作者與文藝創作者，都留下了許多不同版本的夏家故事。這些故事過去常被研究者用來作為拼湊夏家歷史圖象的材料，而本文則試圖透過對這些材料的綜合比較，重建夏氏父子故事的形成史，藉此展現近代中國知識階層的文化心態與其變化。

## 二、走進歷史舞台——城市邊緣的新興士紳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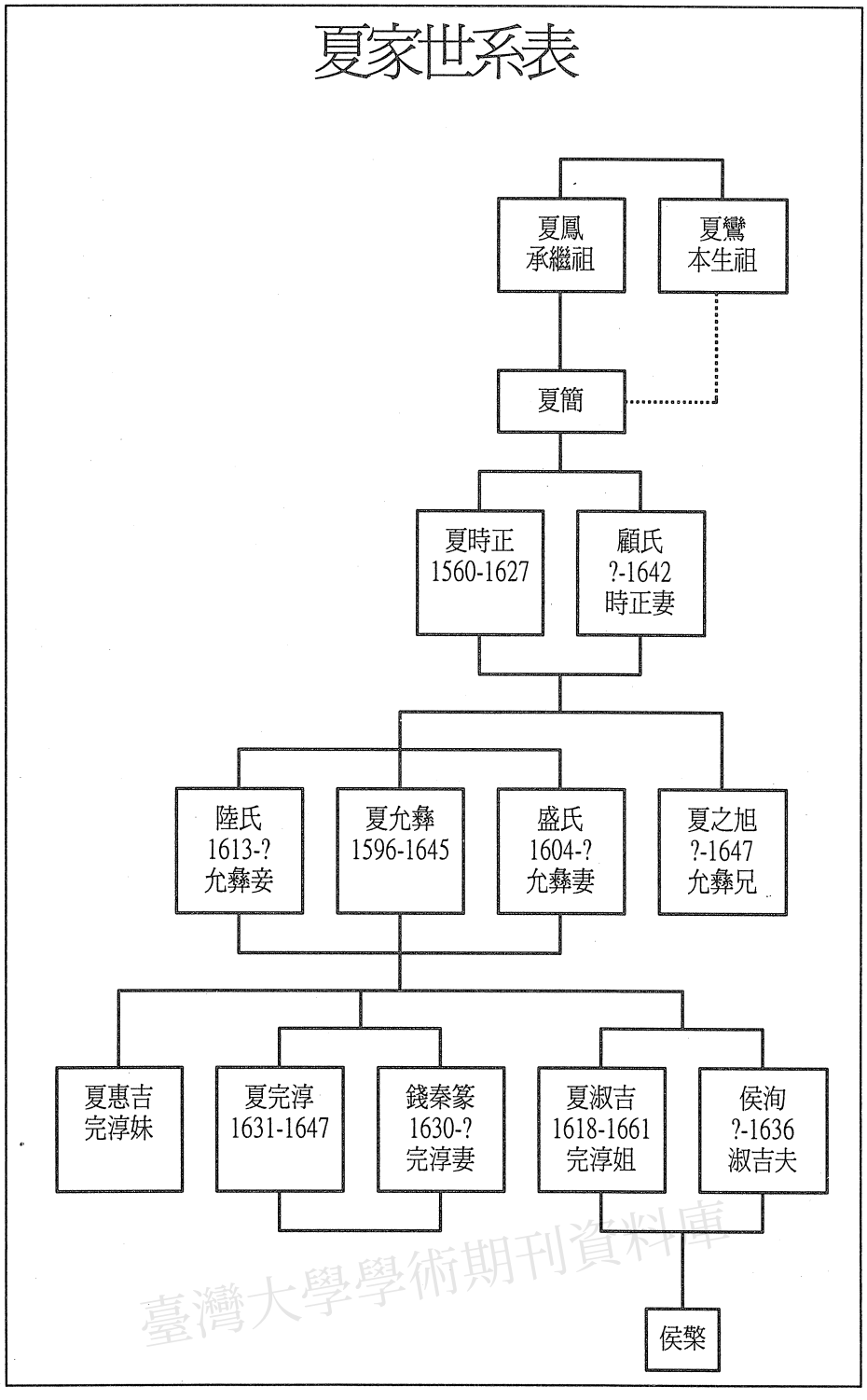
夏允彝與夏完淳父子來自松江府華亭縣一個新興的士紳家庭。夏允彝的父親夏時正（1560~1627）是家中第一個擁有科舉功名的人物。雖然夏時正終其一生不過是個秀才而已，但他的兩個兒子卻都能克紹箕裘，長子之旭[4]（？~1647），貢生出身，次子允彝則是萬曆四十六年（1618）的舉人，並於崇禎十年（1637）成為進士。

---

究所學術研討會論文，1999），28~29。

4 潘光旦在《明清兩代嘉興的望族》（上海：商務印書館，1947）第四章第十六個血系分圖——錢氏（附：吳氏、夏氏、沈氏）中則記為「允懷」，但不知其根據為何。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夏之旭、允彝兄弟均以嘉善籍應科舉考試來看，夏家的先世可能是從嘉興府嘉善縣遷到松江府華亭縣居住。根據王澐（1618~？[5]）的回憶，在明末的松江，士大夫城居的風氣十分盛行，因此稍有能力的士大夫，都會在城內營治宅第。舉例來說，夏允彝的好朋友陳子龍（1608~1647），原來世居華亭縣的莘村，因為家世富裕，父親陳所聞（1587~1626）早登科名，所以在他出生以前，陳家就已經遷到松江城內了。而夏家在夏允彝考上進士以後，雖然也有向松江城推進的現象，卻沒有遷入城中居住。[6]從夏家的宅居位置，我們可以清楚的看到夏家在人文匯萃的松江地區原先所處的邊緣地位，從而驗證了它的新興特質。

夏允彝雖然沒有顯赫的家世，但透過科舉制度的管道，以及相當程度的因緣際會，逐漸受到松江士大夫的矚目。在弘光元年（1645）所寫的《幸存錄》一書中，他簡單的回憶了自己一生的經歷：

> 予少鈍劣，讀書數百過，僅得上口；十五以後，心稍開，不數過亦時能記憶。弱冠名浮，應酬日劇，久困公車，不能舍帖括技；強仕始第，又困簿書。失恃而還，三年崩壞。[7]

夏允彝二十歲出頭就考中了舉人，這樣的成績使他受到不少士大夫的側目。但他投考進士的過程卻很不順利，為了準備考試，夏允彝除了參加當時最著名的文社——復社之外，還與幾個同鄉另外組成了「幾社」。不同於復社的廣開門戶，幾社是「非師生不同社」，[8]因此一直保持著地

---

5 王澐，〈越遊記〉：「予年十有四，始師事大樽陳先生。時歲在壬申，先生方以古文辭倡起東南，牆宇高峻，士之及其門者，造次不能自達。」陳子龍著，施蟄存、馬祖熙標校，《陳子龍詩集》（上海：上海古籍，1983），745。

6 王澐是陳子龍的學生，與夏允彝也很熟悉。根據他的回憶，陳子龍的家是在松江城的西城，夏允彝的居所則有兩處，一是西門外花園濱的舊居，這裡後來成為夏之旭的住宅；一是較接近西門的新居。王澐，《雲間第宅志》（臺北：藝文印書館，1968 年影《藝海珠塵》本），1a、2b、11a；陳子龍著，施蟄存、馬祖熙標校，〈陳子龍年譜〉，《陳子龍詩集》，628。

7 夏允彝，《幸存錄》，《中國近代內亂外禍歷史故事叢書》（臺北：廣文，1964），3。

8 趙郡西園老人口授、蔣烈編，《南吳舊話錄》卷 23（臺北：廣文，1971），995~9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方性文人社團的性質；而相對於復社逐漸捲入政治社會運動，幾社則一直以研習制藝詩文為主要活動，因此在崇禎中葉以後，當復社因為政治上的壓迫與領袖張溥（1602~1641）的去世漸趨衰落時，幾社社友的「雲間派」文學則逐漸在江南士人社群當中引領風騷，而夏允彝的時文稿更是士子模倣的對象。[9]

夏完淳的誕生，為夏家帶來繼續發展的新希望。夏允彝一直到三十六歲的時候，才以納妾的方式得到這個唯一的兒子，[10]對於這個得來不易的後嗣，他自然是盡全力的栽培，而天資卓穎的夏完淳也不辜負父親的期望，自小就在學業上有超乎常人的發展。此外，由於父親的關係，夏完淳很早就進入了江南士大夫的社交圈。松江名士陳繼儒（1558~1639）早在夏完淳五歲的時候，就為他寫了一篇〈童子讚〉，並聲明：「非敢佞也，吾有所試矣。」夏完淳的妻舅錢默（1624~？）[11]也在夏完淳六歲的時候，為他寫了一篇〈神童賦〉。這些文章都是在崇禎年間就已經刊行，由此可以想見神童夏完淳應當在明末清初的松江社會中相當知名。[12]

---

9 《南吳舊話錄》卷 13，頁 642：「時瑗公時藝半為他人借刻」，夏允彝時文稿的風行程度由此可見一斑。關於幾社的成立與發展過程，參見謝國楨，《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臺北：商務，1967），187~203。《欽定四書文》的編者方苞認為幾社制藝「多務怪奇、務矜藻思」，只有陳子龍與夏允彝的作品「清古雄直」，可以成為不朽之作。見《夏節愍全集》(臺北：華文，1970 年影光緒 20 年成都重刊本)，卷末，頁 8a。有關明代文社對時文風氣的影響，可參看劉祥光，〈時文稿：科舉時代的考生必讀〉，《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2 期（1996，臺北），65。

10 夏完淳的生母陸氏生於萬曆四十一年（1613），她生下夏完淳的時候才十九歲，可見夏允彝當是在三十多歲時因為無子才納妾。關於夏允彝妻妾的生年資料，見白堅，《夏完淳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1991），〈前言〉，28。

11 白堅據《南疆逸史．錢栐傳》所說，錢默在崇禎十六年（1643）成進士時，年僅十五歲，推定錢默當生於崇禎二年（1629），即錢默比夏完淳大兩歲；但陳子龍，〈題錢仲子神童賦後〉中說，錢默在寫〈神童賦〉的時候是十三歲，而夏完淳則是六歲，據此，錢、夏二人應該相差七歲，亦即錢默當生於天啟四年(1624)。見白堅，《夏完淳集箋校》，731。

12 白堅，《夏完淳集箋校》，727~73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崇禎十年（1637），夏允彝終於如願以償的考上了進士，隨即帶著家眷前往福建擔任長樂知縣，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個實授的官職。崇禎十五年（1642），他因為母親顧氏過世而丁憂回籍，經過二十年努力才換得的短暫仕宦生涯，至此告一段落。

夏允彝雖然沒有顯赫的仕宦經歷，但他的社會聲望，卻使「草木門庭，旂常家世」[13]的夏家能夠與江南名門結為兒女親家。夏允彝的長女淑吉（1618~1661）嫁給嘉定侯岐曾（？~1647）的兒子侯洵（？~1636）；他的獨子完淳則娶了嘉善錢枏（1598~1647）的女兒錢秦篆（1630~？）。只不過，時局已不容許夏家做進一步的發展。由於與抗清勢力有所牽連，夏家的男性成員夏允彝、夏之旭、夏完淳等，在順治二年（1645）到順治四年（1647）間陸續自殺或被處死，而侯家與錢家也有類似的遭遇。一度充滿無限可能的夏家，就這樣消逝在明清之際的漫天動亂中，但夏家成員曾經發出的光采，卻使他們的故事不僅沒有隨著夏家的殞滅消逝，反而更得到時人與後人的傳誦。

## 三、夏家親友的記述——以夏允彝為中心的故事

夏家父子雖然都以文字聞名，但我們所知道的夏家故事，大多出自他人的手筆。現存寫作時間最早的一篇記述夏家故事的文章，是陳子龍在順治三年（1646）[14]所寫的悼祭文〈報夏考功書〉。[15]

陳子龍筆下的夏允彝，給人的第一印象，是具有知人之明、樂於提攜後進。陳子龍回憶，他認識夏允彝的時候還不到二十歲，[16]但當時已是一位知名舉人的夏允彝，卻願意與他結為忘年之交。由於夏允彝的讚

13 這是夏完淳在〈大哀賦〉中自述家世的用語，見《夏節愍全集》卷1，頁10b。

14 王澐，《陳子龍年譜》，見陳子龍著，施蟄存、馬祖熙標校，《陳子龍詩集》，715。

15 陳子龍，《陳忠裕公全集》卷27（臺大圖書館藏，嘉慶8年斠山草堂刊），頁15a~19b。

16 陳子龍在自訂年譜中，將陳、夏訂交的時間繫在天啟五年（1625），見陳子龍著，施蟄存、馬祖熙標校，《陳子龍詩集》，637~638。

臺灣大學博物館期刊資料庫

譽稱揚，陳子龍的文名日益彰顯，並在天啟六年（1626）順利取得秀才功名。在此後的二十多年中，他們擁有許多共同的經歷，也共同面對了各種困難險阻，陳子龍因此說他們之間的友誼是：「形雖異氣，義同孔懷。」

夏允彝除了是一位直、諒、多聞的益友之外，也是一個清廉、寬仁、勤勉、明斷的好官。陳子龍說，他與夏允彝在崇禎十年（1637）一起考上了進士，之後雖然一個在浙江擔任紹興推官，一個則到福建擔任長樂知縣，但他們時常藉著魚雁往還來相互切磋與勉勵，因此兩人在職務上都有相當優異的表現，並在崇禎十六年（1643）的天下賢能官吏選拔中名列前茅。[17]陳子龍因此擢升兵科給事中，而夏允彝因為正在丁憂期間不能立即起用，但還是得到崇禎皇帝「書名御屏」的嘉勉。[18]

陳子龍除了讚揚夏允彝的政績之外，也非常稱許夏允彝的識見，特別是他對晚明黨社運動的看法：

> 僉人險夫，妨賢醜正，為國蟊賊，固無足論；獨君子風規英邁，牆宇凝整，病在好同嫉異，真偽罔分，故道廣道峻，各有其患。又不求可仗之人，講救時之略，以濟當世之急，而坐論節槩，專別流品，恐後世議成敗者，將與小人分謗。[19]

不過，夏允彝雖然相當程度的意識到東林派本身的盲點，並強調為政應當「秉至公、渙群小」，但他原有的結社背景、交遊狀況以及他的政治立場，卻使他很容易就被貼上東林派的標籤，而不得不捲入東林與非東林的政爭當中。身處這樣一個紛擾、腐敗的官場中，夏允彝很快的就萌生去意。

陳子龍說，夏允彝在丁憂回籍以後，已經做了歸隱的打算，但崇禎十七年（1644）的劇變，使他一度離開幽靜的山居，走到復國戰爭的前

17 陳子龍在自撰年譜中說：「時冢宰鄭元嶽先生為政最清嚴，舉天下有司大廉卓者八人，以予為首，奉旨優擢。」見陳子龍著，施蟄存、馬祖熙標校，《陳子龍詩集》，677。

18 陳子龍著，施蟄存、馬祖熙標校，《陳子龍詩集》，15b~16a。

19 陳子龍著，施蟄存、馬祖熙標校，《陳子龍詩集》，15a~15b。

臺灣人文學與期刊資料庫

線，投入籌辦水師的工作。但由於南京政府隨即發生嚴重的政爭，他於是再度回鄉，且從此「堅臥不出」。[20]

弘光元年（1645），清廷揮軍南下，五月，南京即告失守。在此後的幾個月當中，清廷除了以武力攻城掠地外，也運用各種故舊關係來徵聘知名的士大夫，而夏允彝與陳子龍當然都是清廷延攬的對象。陳子龍描述當時夏允彝的活動：

> 北兵渡江，列郡茅靡。舊交故帥，受旨移書，逞其詭詞，妄為招誘。僕作逋臣，莫能躡跡，而足下則見裨將，答書數百言，責以大義，矢以靡他。至各郡義兵起，同志之士，紛紛建旗鼓，足下斷其不可恃。次第得徐冢宰、徐詹事、侯納言諸公死問，語僕曰：「事勢不可為，惟有守正不屈，以從諸君子而已。」[21]

相對於出逃在外的陳子龍，家居的夏允彝，在直接面對清廷勸降壓力的情況下，要堅守不事二主的原則，必須接受更嚴格的考驗，也正因為如此，夏允彝的始終不為所動，以及最後的自沈而死，在陳子龍看來，是一種非常高難度的道德實踐。陳子龍更強調，夏允彝的死之所以可貴，是因為它既不是時勢逼迫下的無奈之舉，也不是一時意氣所激，而是出

---

20 陳子龍在自訂年譜中，對自己在這段時期的出處選擇，有較清楚的陳述，或許可以用來作為觀察夏允彝的參照點。陳子龍說，他在崇禎十七年（1644）三、四月間，已經辭官回鄉奉養年邁的祖母。當時北方情勢十分危急，他因此和一些同志上書建請太子出京南下，他們表示願意捐出全部家產來籌辦水師，協助太子復興明室，但這項計劃還來不及實行，北京城便告陷落。到了五月，南京新成立的福王政府，恢復他兵部給事中的原職，而兵部尚書史可法也因為他之前曾經提出興辦水師的建議，寫信邀請他參與新政府，陳子龍因此在覺得「江左事尚可為」的情況下，在六月中旬到南京就職。但他到南京後不久，就發生都察院左都御史劉宗周上書糾彈執政大臣與擁兵四鎮的事件。雖然陳子龍與秉政的馬士英有舊，可是因為他與劉宗周也有往來，而他自己在任內所提出的奏章，對馬士英政府有非常嚴厲的批評，因此馬士英開始疑心陳子龍也加入反對自己的陣營，甚至還懷疑他和左良玉的叛軍有所連絡。陳子龍在感到「時事必不可為」、「再出必重禍以為親憂」的情況下，決定辭官回鄉，在職不過五十日。見陳子龍著，施蟄存、馬祖熙標校，《陳子龍詩集》，688~704。

21 陳子龍，《陳忠裕公全集》卷27，頁17a。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夏允彝個人自主的選擇與堅持。[22]

繼陳子龍之後，夏允彝的另一個好朋友宋徵輿（1618~1667），也在順治五年（1648）寫了一篇〈夏瑗公先生私謚說〉，[23]來紀念與表彰他的死節。

相對於陳子龍的抗清至死，宋徵輿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則已經是個清朝的官員了。或許是考量到自己作為一個「變節仕清」的人，沒有評價殉節者的發言地位，所以這篇文章的主要內容是在引述陳子龍對夏允彝之死的評價。雖然如此，〈夏瑗公先生私謚說〉與〈報夏考功書〉中的言論立場卻有相當大的差異。如前所述，〈報夏考功書〉強調的是夏允彝胸中「素所蓄積」的忠誠，但〈夏瑗公先生私謚說〉所表彰的則是夏允彝的「忠惠」，而因為宋徵輿認為夏允彝的「忠」行人皆知，所以他特別強調夏允彝的「惠」。

什麼是「惠」？宋徵輿引述陳子龍的話說：

> 知死必勇，夫夏子豈不知致憤於疆，必有與斃哉？豈不知絕脰剖肝，足以耀志哉？以為彰譽而殘民，亦勿攸濟，有勿忍也。且夏子曰：「余以國固也。夫宗何罪？余有以考，而余兄與余子也免，先人其無余尤！」外及寬乎國，內及愛乎宗，令終有俶，施及生民，不亦惠乎！[24]

這段話是否真的出自陳子龍之口，現在已經難以查考，但宋徵輿認同這樣的評價卻是無庸置疑的。透過將夏允彝之死詮釋為不肯連累他人的自我犧牲行動，並把它和株連甚廣的陳子龍之死相對照，宋徵輿或許為自己的不反抗，乃至於出仕清朝，找到了一個藉口；另一方面，經由強調夏允彝的盡忠方式不但對清朝政權無害，而且還有利於建立與鞏固清朝君臣之間的名教，宋徵輿也將自己之前的社會關係中的負面因素轉化為

22 陳子龍，《陳忠裕公全集》卷27，頁17a。

23 宋徵輿，《林屋文稿》卷16，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215冊（臺北：莊嚴，1997），頁6b~8a。

24 宋徵輿，《林屋文稿》卷16，頁6b~8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正面因素。

陳子龍與宋徵輿的作品，都著重在詮釋夏允彝的死亡，並沒有對他的自殺經過做太多的敘述，因此讀者根本無法看到詮釋與事件之間的連繫，而可能輕易摒斥「政治立場錯誤」的宋徵輿所做的詮釋。但從侯玄涵的〈吏部夏瑗公傳〉中我們可以看到，宋徵輿的詮釋其實是以一個陳子龍未曾提及的事件為基礎。

侯玄涵（1620~1664）是夏允彝的親家侯岐曾的兒子，他所寫的〈吏部夏瑗公傳〉可以說是幾篇夏家親友的記述中，最有系統的一部作品。這篇文章的敘事，主要也是以陳子龍〈報夏考功書〉為張本，但補充了〈報夏考功書〉中所闕略的兩個時段的故事：一是夏允彝在福建長樂知縣任內的建樹，一是夏允彝在弘光元年（1645）自殺前後的具體經歷。

根據侯玄涵的記載，夏允彝與松江起義的關係，只是他應陳子龍的要求，寫了一封信給他的門生江南總兵吳志葵，要他帶著水軍經吳淞江攻打蘇州。後來，吳志葵兵敗，松江城陷落，有人勸夏允彝經由海路到福建去另謀發展，但夏允彝認為這種舉事失敗就逃亡求生的行為並不恰當。侯玄涵引述夏允彝的話說：

> 吾昔吏閩，閩中八郡咸懷思我。今駕一航南趨，圖再舉事，固善。然舉事一不當，而行遯以求生，何以示萬世哉！吾將從虞求、廣成游耳。[25]

這一個故事應該就是宋徵輿據以立論的事件，但相對於宋徵輿將夏允彝的不逃亡詮釋為「惠及宗國」，侯玄涵則認為夏允彝是在效法與建立「捨生盡忠」的典範。引文中所出現的「虞求」、「廣成」，指的是夏允彝的好朋友徐石麒（1578~1645）和侯峒曾（1591~1645），他們先前都已經因為兵敗城破而死難，其中侯峒曾就是侯玄涵的伯父。

相對於徐石麒、侯峒曾都是在兵敗城破時自殺或被殺，夏允彝在松江城破時，雖然已經表明願意坦然面對死亡的決心，卻並沒有立刻「慷慨殉節」。

---

25 《國粹學報》14期（1906，上海），〈撰錄〉，2b~3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侯玄涵指出，清廷的徵辟是促使夏允彝自殺的直接原因：

> 鎮帥以素聞公名，必欲致一見，且曰：「夏君來歸，我大用之；即不願，第一見我。」公乃書於門曰：「有貞婦者，或欲嫁之，婦不可，則語之曰：『爾即勿從，姑出其面。』婦將搴帷以出乎？抑以死自蔽乎？」遂盡斥其家人，賦詩曰：「少受父訓，長荷國恩。以身殉國，無愧忠貞。南都繼沒，猶望中興；中興望杳，安忍長存！卓哉吾友：虞求、廣成、勿齋、繩如、慈人、蘊生，願言從之，握手九京。人誰無死，不泯者心。修身俟命，敬勵後人。」詩竟，自投於淵。屍浮水上，衣帶不濡。死三日，而黃學士道周，果奉檄以翰林侍讀兼給事中招公急往，至則公甫入殮。使者以書倚櫬，叩頭慟哭而去。[26]

根據侯玄涵的描述，清朝官方至少在表面上願意尊重夏允彝對出仕與否的決定，只要求夏允彝與他們做一次面對面的接觸，但夏允彝為什麼要以死亡來回應清廷的要求呢？

我們固然可以這麼說，清廷在正式入主松江府之後，它對松江士大夫施壓的工具就不再像之前那樣，主要是「舊交故帥」的人情壓力以及稍具距離的軍事暴力，而是更能直接施壓的政府統治權力，因此夏允彝在拒絕與清廷官員會面時所感受到的壓力，也比過去大了許多，這樣的壓力迫使他以死亡回應清廷的辟召。綜觀其他許多明遺民的作為，死亡並不是拒絕辟召的唯一方式，隱遁、逃禪也是許多明遺民經常採取的方式。但對夏允彝來說，後兩種方式，雖然保全了忠貞，卻是一種「偷生」的行為。那麼他的不與城偕亡，難道就不是「偷生」嗎？事實上，從夏允彝自比為「貞婦」，我們可以看出夏允彝並不認為一個亡國士大夫必須以身殉國，只要他能夠像守身不嫁的貞婦一樣不出仕異朝就算盡了人臣的本份，而這應該就是他選擇不與城俱亡的理由。

對於守身不仕的明遺民而言，清朝官員對他們的徵辟，可以說是對其的志行的嚴格考驗，或許就是在這樣的脈絡下，隱遁與逃禪才會被視

26《國粹學報》14期，〈撰錄〉，3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為逃避試煉的「偷生」行為。由於夏允彝一開始就以不逃亡來表明自己的確願意為抗清付出生命的代價，同時也願意坦然的面對即將到來的各項試煉，最後並以抵死拒絕與清朝官員會面的方式，表明自己絲毫沒有出仕異朝的打算，因而受到時人與後人極高的推崇，許多人甚至認為夏允彝在亡國之際的表現，比屢興義兵、繼之以死的陳子龍還要卓越。近人何冠彪在其對明清之際殉國行為的研究中，對時人的這種看法提出了質疑。[27]

何冠彪以是否積極參與起義反抗活動為標準，將明末殉國者籠統的分為積極進取與消極退縮兩型，指出許多明清之際的士大夫有將二者等而觀之的傾向。而他並沒有對這個現象提出解釋，只以後者的死亡無補於國事為由，說古人這樣的想法是思考上的失誤。[28]但從夏家親友的記述來看，我們可以發現何冠彪的說法可能有忽略歷史脈絡之嫌。那些書寫夏家故事的夏家親友，雖然在政治立場上有所不同，但他們在觀察與詮釋夏允彝的死亡時，都著重在指出這樣的行為如何踐履著道德的標準，而不是如何贊助著反清復明的事業。這樣的論述所透露的價值取向是：道德實踐的重要性，也許比明朝的興復更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於這樣的價值取向並不是降清者的專利，因此這種價值觀的形成似乎不能簡單的看作清朝官方政治教化的成果，而可能具有需要另外進行深入探討的複雜文化脈絡。

在這三篇夏家親友的記述當中，由於寫作時間與題旨的限制，只有〈吏部夏瑗公傳〉在末尾提到了夏完淳，而夏完淳之所以被提起，乃因他是夏允彝的兒子：

> 公子完淳，四歲能屬文，誦群書數十萬言。文采宏逸，江左絕儷。為錢枏婿，居禾郡，頗通問浙東，授試中書舍人。後復拜表普陀，為守帥偵得見收，與顧咸正、劉曙同繫建康獄，談笑如平生，作新聲樂府數十闋。臨刑，意氣揚揚。所著文多散佚，存詞賦雜錄數卷。

27 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臺北：聯經，1997），161~162。

28 何冠彪，《生與死：明季士大夫的抉擇》，207~2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嘗自言：七歲操觚，九歲成章。出入古今，咀含英華。有韻之文，自謂無敵；無韻之文，通達而已。方十七歲，遽殉節忠孝，公竟不祀，識者悼焉。[29]

這僅僅一百五十字左右的小傳，也許是現存最早的一篇較完整的夏完淳傳。在這篇傳記中，侯玄涵以白描的筆法，清晰的勾勒出夏完淳的性格與生平梗概——一個早慧、充滿自信的年輕文人，以及一個從容赴義的青年殉國者。

由於夏完淳是以「夏允彝之子」的身份出現在文獻當中，因此夏完淳的身殉復明運動，在侯玄涵看來，除了表現出一個遺民對故國的忠誠之外，也是追隨父親遺烈的孝行。而也正因為侯玄涵將夏完淳定位為「夏允彝之子」，他對夏完淳之死所感到的遺憾，並不只是對夏完淳個人際遇的惋惜，還有對夏家絕嗣命運的哀悼。

在夏家親友所記述的夏家故事中，陳子龍可以說是最權威的消息來源，這並不只是因為〈報夏考功書〉的寫作時間最早，陳、夏之間的深刻交誼，也許更是人們之所以願意相信陳子龍的原因。而雖然宋徵輿與侯玄涵的記述，都大量的引用陳子龍的話語與文字，但在傳述的過程當中，他們也做了不少增刪與改動，因此使得這三篇文章呈現不同的樣貌。

在清朝初年，夏家的故事其實並不只有陳子龍一系的說法，不過除了宋徵輿的〈夏瑗公私謚說〉曾在康熙年間刊刻之外，其他夏家親友的作品似乎都沒有廣為流傳。可惜執筆書寫夏家故事的夏家親友，並沒有記錄下自己在書寫過程中的心路歷程，使我們無法窺探他們在書寫與傳散作品時的諸多考量，而只能透過觀察其他有類似遭遇的人們，來推測夏家親友狀況。

康熙三十一年（1692），時年已經七十五歲的王澐，完成了《續陳子龍年譜》。他在跋語中說，早在許多年前，宋徵輿就已經為陳子龍寫了一篇〈於陵孟公傳〉，雖然宋、陳兩人是多年好友，但宋徵輿在這篇傳記裡，卻引用了許多失實的傳聞。王澐認為，自己作為陪伴陳子龍度

29《國粹學報》14期，〈撰錄〉，3b~4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過最後歲月的學生，有義務出面釐清事實，否則以後就再也沒有人知道陳子龍晚年生活的實際樣貌了。

早在順治五年（1648），王澐就起草編寫這本年譜，但不久即傷心輟筆，直到四十多年後，陳子龍的寡妻去世時，他才重新整理舊稿，完成了這部作品。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喪禮的舉行可能與親友的書寫活動有密切的關係，而喪禮時的聚會或許就是夏家親友那些未刊刻作品的重要傳散管道。

雖然王澐寫作年譜的原因是為了匡正傳聞之誤，但他卻沒有將年譜廣為刊行的打算。王澐說，他要將年譜的正本燒給陳子龍，至於副本則暫時由他自己收藏，等陳子龍的曾孫陳世貴長大以後，再交給陳家收藏。從王澐對《續陳子龍年譜》的處置計畫，我們看到明末殉難士大夫的親友們在從事書寫活動時所感受到的恐懼與壓力，而他們面對這種壓力的方式，則是藏諸名山、傳諸後人的老辦法。但王澐也清楚的意識到，在他這樣的安排下，宋徵輿版乃至於其他各種版本的陳子龍故事仍會繼續在社會上流傳，所以他在跋文中不只一次的強調自己是「據事實書」、「字字皆實錄」，原因只是為了不讓後人在看到他的作品時反而感到無所適從。[30]

從王澐的例子可以看到，人們在面對各種不同版本的殉國者故事時，常以書寫者與被書寫者的關係作為衡量信實度的標準，因此親友們的記述，往往被賦予較高的可信度。但另一方面，當書寫者與被書寫者之間的關係越親密，書寫者因此肇禍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那些與被書寫者有親密關係的人，反而更會設法用曲筆寫作，或以嚴密收藏的方式來隱瞞其中的細節。這正是各式各樣的異傳得以出現並持續存在的社會脈絡。

## 四、夏家故事的異傳

30 陳子龍著，施蟄存、馬祖熙標校，《陳子龍詩集》，726~7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代所流傳的夏家故事，就傳散方式而言，可以分成傳說與傳抄兩個系統。二者最大的差別，在於前者是以口語的方式傳播，後者則是以文字的方式傳播。不過，這兩個系統之間並不是毫無關聯，因為傳說系統的故事會不斷地被文字化而進入傳抄的系統，傳抄系統的故事也會不斷地口語化而重新進入傳說的系統，所以兩個系統之間實存在著複雜的流通、互動及競爭關係。在三百多年後的今天，我們已經很難去探索那些以口語方式傳播的夏家故事，而只能透過已經文字化的故事去想見口語傳播時期的樣貌。換句話說，本文在此所能加以探討者只是傳說系統的文字化，與傳抄系統內部的演化。

在康熙中葉以前，書寫者對夏允彝的基本資料，諸如字號、科第、官歷、自殺方式，乃至於絕命辭的內容等，已經能夠大體掌握。比較飽學的書寫者，如朱彝尊（1629~1709，浙江秀水），則甚至可能讀過夏允彝自己的詩文，因而對野史中的夏允彝傳記產生了若干懷疑。[31]

在康熙中葉以前，各種不同版本的夏家故事最可能發生差異的地方，就是在涉及夏完淳與夏之旭部份的史事。

海寧人查繼佐（1601~1676）在〈行取知縣夏公傳〉的初稿中說：

> 夏允彝，字瑗公，華亭人。丁丑進士。才致宏敞，海內文章領袖。為閩中令，治行第一。分閫所得士為何家駒等，一時稱名傑，亦分典閫粵中，士風為丕變，皆知經術。清兵下，郡縣望風解，旋布薙髮之令，允彝義不辱，赴水死。子完醇，字存古，稱神童，聞父變，亦隨自盡。[32]

這篇傳文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就是有關夏完淳隨父自盡的敘述。事實上，在篇幅增加一倍的定稿中，查繼佐已經刪除了這段敘述。其中的原因，由於查繼佐的沈默，後人已無從得知。但從定稿中將重點放在敘述

31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學林類》冊10（臺北：明文，1991），頁155。

32 查繼佐，《國壽錄》，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冊107，頁63。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甲申以後的夏允彝，並且能夠引述夏允彝絕命辭，[33]我們似乎可以推測，查繼佐很可能因為看到了新材料而發現這段敘述的謬誤。

夏完淳隨父自盡的說法，並沒有在清初消失。近人白堅指出，在乾隆時代編寫的《長樂縣志。名宦。夏允彝傳》中，仍然有夏完淳隨父自盡的說法：「南京失守，公與兄之子旭、子完淳，舉家投淮。」而在同治、民國兩次重修縣志的過程中，這樣的敘述也沒有被改動。[34]

和隨父自盡說相反的一種說法，是一再起義的說法。沈仲方（1612~？[35]）說，夏完淳喪父之後不久便發生太湖起義，當時他曾作表與魯王連絡，且因事跡不密而被逮捕，所幸得到故明降將吳勝兆的掩護，才得以脫身。後來吳勝兆起兵反清，夏完淳因此成為他與陳子龍、魯王政府與松江士紳之間的連絡管道。而在起義失敗以後，相對於同案諸人的重賄乞生、戰慄受刑；夏完淳則從一開始便視死如歸，且在受刑的時候「挺立衝刃」。[36]

張岱（1597~？）同樣也認為夏完淳上表魯王一事，因為吳勝兆的掩護而沒有被追究，但夏完淳的死難並不是因為他參與吳勝兆起事，而是因為吳勝兆兵敗，清廷搜查吳勝兆衙署時發現了夏完淳的表文所致。[37]

同樣是持一再起義說的屈大均（1630~1696），他所說的故事，又與沈仲方、張岱不同。屈大均說，夏完淳一開始先跟著陳子龍起兵太湖；子龍戰敗以後，夏完淳轉而到吳易（書中作「昜」）的義軍中擔任參謀；後來吳易的起事也告失敗，夏完淳因此轉而與吳勝兆合作起事，最後因

---

33 這段引文所引述的部份，和陳子龍與侯玄涵所引述的文字只相差一個字，即將「繩如」的「繩」字寫為「成」字，而未引的部份則是：「人誰無死，不泯者心。修身俟命，敬勵後人」。

34 白堅，《夏完淳集箋校》，544~545。

35 沈起，〈墨子語後自序並詩十九章〉：「語成而歲在重光作噩，月臨壽星、日在角，而墨子年已七十矣。」，見查繼佐，《東山國語》，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冊107，頁307。

36 沈仲方補，〈夏完淳傳〉，收入查繼佐，《東山國語》，頁299~301。

37 張岱，《石匱書後集》，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冊104，頁212。

臺灣大學圖書館資料庫

為起事失敗而被捕。在沈仲方與張岱所說的故事中，雖然都提到了審訊的過程，但並不是重點所在。而在屈大均所說的故事中，審訊一節，竟然占了將近一半的篇幅。故事中的洪承疇、夏完淳與錢栩三人在審訊過程中的互動，更是一個非常戲劇性的場面：

> 至留都，叛臣洪承疇欲寬釋之，謬曰：「童子何知？豈能稱兵叛逆？誤墮軍中耳，歸順當不失官。」完淳厲聲曰：「吾嘗聞洪亨九先生，本朝人傑，嵩山、杏山之戰，血濺章渠（「章」，陳本作「溝」），先皇帝震悼褒卹，感動華夷。吾嘗慕其忠烈，年雖少，殺身報國，豈可讓之？」左右曰：「上坐者，即洪經略也。」完淳叱之曰：「亨九先生死王事已久，天下莫不聞知，曾經御祭七壇，天子親臨，淚滿龍顏，群臣嗚咽。汝何等逆賊，敢偽託其名，以汙忠魄？」因躍起奮罵不已，承疇無以應，惟色沮而已。時完淳婦翁職方主事錢栩同在訊，氣稍不振，完淳厲聲曰：「當日者，公與督師陳公子龍及完淳三人同時歃血，上啟國主，為江南舉義之倡，江南人莫不踴躍。今與公慷慨同死，以見陳公於地下，豈不奇偉大丈夫乎哉？」栩遂不屈，與完淳同死。[38]

由於夏之旭在前述由夏家親友所書寫的夏家故事中並沒有出場，因而使夏之旭的故事有較大的變易空間。就筆者所知，在康熙中葉以前，最早提到夏允彝兄長的夏家故事書寫者，應是寧波人高宇泰[39]（1618~1678）：

> 夏允彝，字彝仲，號瑗公；松江人，丁丑進士。初知福州長樂縣，以才擢吏部主事。未幾，以憂歸。虜軍至，匿居山中。兄某先投附；虜大索，執其兄問之。兄素無行，遂導執公；公語執者曰：「須冠服往拜先冢，然後薙髮；乞假我須臾！」執者許之。既至，拜訖，

38 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卷6（臺北：鼎文，1978），頁225b~226a。

39 全祖望，〈高武部宇泰傳〉，見高宇泰，《雪交亭正氣錄》，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名人類》冊68，頁348：「嘗自言得年六十當死；及六十，竟無恙。次年戊午，無疾而逝。」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遂投冢前池內死。其兄聞之，歎曰：「嗟乎！吾弟焉得有我之為兄乎！」遂往縊於先師廟。其兄素為人不齒，至是人並稱之。踰二年，公子完淳與陳臥子起兵以死。[40]

這篇傳記中的基本資料，如夏允彝的字號、籍貫、科第、官歷，允彝、之旭兄弟的自殺方式，與夏完淳的死亡時間等都與通說無異，甚至連夏允彝的絕命詞都抄錄得十分完整，[41]但這個故事的情節卻與通說大相逕庭，而且也沒有說出「之旭」的名字。

在現存的早期文獻中，的確存在著一位「夏之旭」。張岱《石匱書後集》裡有一篇相當長的〈夏之旭傳〉。傳中的夏之旭是浙江嘉興的庠生，也是陳子龍手下一個非常幹練善辯的幕僚。他曾經參與吳易的起兵，代表江南義師和魯王聯絡，乃至奉陳子龍之命策反松江總兵吳勝兆。吳勝兆兵敗後，夏之旭因被人密告而受通緝，最後在文廟顏回神位前自縊身亡。[42]

在查繼佐的《國壽錄》中也有一位擁有類似經歷的夏姓人物——夏寶謨：

> 夏寶謨，嘉善諸生也。初從吳易起義，潛走浙東，請兵監國。時清人為間于國舅張國俊曰：「清督撫行表降于魯。」朝廷信之，以為坐受杭、嘉諸郡矣。寶謨以易疏至，廷諍之日，毋為小人所算，勢未有我力不敵，彼反屈下我者，遂不受紿。浙東敗，復以陳子龍意，遊說清松江鎮將吳聖兆。丁亥四月十七日，聖兆且起事，不成，索子龍急，有告寶謨當知子龍處，及得子龍，以嘗與謀，同徐爾穀、王濤、錢栿、張寬逮南都，獨濤得脫，其四十三人同日遇害。[43]

類似的故事又出現在番禺人屈大均的《皇明四朝成仁錄》裡，只是傳主

---

40 高宇泰，《雪交亭正氣錄》，頁201~202。

41 高宇泰所引述的絕命詞，與侯玄涵的版本只有一字之差，即將「不泯者心」寫作「不泯此心」，見高著頁202。

42 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冊104，頁219~222。

43 查繼佐，《國壽錄》，頁1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名字既不是夏之旭，也不是夏寶謨，而是夏發英：

> 夏發英，字寶沐，嘉興諸生。陳子龍與吳易起兵，嘗遣發英往紹興，條陳策應機密，魯監國錄其勤勞，授行人。及吳聖兆與子龍等謀反正，令往舟山見肅虜侯黃斌卿，約同舉事。發英方報命，聖兆兵起，颶風大作，海師不能至，聖兆遽為中軍詹甲所殺，其參謀長洲戴武功（「武」，陳本作「生」）、平湖陸瞻伯（「伯」，陳本作「佝」）並死之。子龍復欲遣發英至嘉興，約同志，圖再舉。敵追之急，投水死，發英亦為敵所得，不屈死之。[44]

綜觀這三篇傳記，雖然傳主的名字各不相同，但事蹟卻有極高的相似性，〈夏之旭傳〉與〈諸生夏寶謨傳〉甚至連文字也有許多雷同的地方，只是兩位傳主的結局有所差異，前者自縊，後者被處決。而〈夏發英傳〉與〈諸生夏寶謨傳〉，則除了「寶沐」與「寶謨」二字的聲音近似之外，兩位傳主的經歷與結局更是幾乎完全相合，從這裡我們可以大膽的推測三者應該是從同一個故事演變出來的。但究竟那一個故事會比較接近原型呢？白堅在《明清檔案》中所找到的一份揭帖，為我們提供了答案。順治四年（1647）九月廿四日，江南總督洪承疇向清廷報告處決吳勝兆謀反案一干人犯的情形，其中一個被處決的人犯，名字叫做「夏保謨」。[45]這個證據顯示查繼佐的版本應當是比較原始的版本。

這位在順治四年（1647）被處決的「夏保謨」，究竟是不是夏允彝的兄長夏之旭呢？對於這個問題，屈大均的答案是否定的。他在〈夏允彝傳〉中明白的寫下：「允彝之兄旭〔敏案：「之兄」二字疑倒置〕，後涉吳聖兆之難，自縊死。」[46]另一方面，根據徐秉義《明末忠烈紀實》中的記載，夏之旭的死是因為受到陳子龍的牽連，而且是在孔廟中自縊

---

44 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卷6，頁230b。

45 從揭帖中將錢栟的字「彥林」寫作「彥淋」，我們似乎不必太在意「保謨」與「寶謨」之間的差異。該揭帖見白堅，《夏完淳集箋校》，654。

46 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卷6，頁229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身亡的。[47]換句話說，在受陳子龍牽連而死的人士當中，實際上有兩個夏姓人士，一個是被梟斬的夏保謨，一個是自縊的夏之旭。或許是因為兩人都姓夏，而且又都牽涉到陳子龍案，因而張岱才會將夏保謨與夏之旭視為一人，並將兩個故事雜糅在一起。

就現有的材料來看，康熙時期是夏家故事逐漸文字化的重要階段，但大多數人在將傳說「文字化」的過程中，可能也像夏家的親友們一樣，不見得有將這些文字公開發行的勇氣。而由於大多數的資料都只透過傳鈔的方式在有限的群體中收藏與流通，因此使得資料與資料之間缺乏互相比較參證的機會，從而使各式各樣的異傳擁有各自的活動空間。

## 五、史臣的修撰

在康熙中葉以後，清人對夏家故事的書寫，有由簡而繁、由紛歧而趨於畫一的趨勢，這個現象可能與《明史稿》列傳部份的完成有莫大關係。

自康熙十七年（1678）起，清廷即以國家的力量徵集人才與圖書，展開《明史》的修纂工作，至康熙四十年（1702）實際負責纂述工作的萬斯同去世時，列傳部份的初稿已經完成。[48]初稿在康熙五十三年(1714)由王鴻緒上呈朝廷，經過長期的修訂，至乾隆初年頒行於世，也就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明史》列傳部份。

對於從《明史稿》到《明史》之間漫長的修纂過程，《廿二史劄記》的作者趙翼，認為這是使《明史》臻於完善的關鍵：

> 古來修史，未有如此之日久而功深者也。惟其修於康熙時，去前朝未遠，見聞尚接，故事跡原委，多得其真，非同《後漢書》之修於宋，《晉書》之修於唐，徒據舊人記載而整齊其文也。又經數十年

47 夏完淳，《夏節愍公全集》卷末，頁1a~2a。

48 溫睿臨，《南疆繹史》，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冊104，頁5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參考訂正，或增或刪，或離或合，故事益詳而文益簡。且是非久而後定，執筆者無所徇隱於其間，益可徵信。[49]

然而，我們從〈夏允彝傳〉中看到的並不是這樣一個情況。以下，筆者將透過比較《明史稿列傳》卷一五三〈夏允彝傳〉[50]與《明史》卷二七七〈夏允彝傳〉[51]之間的異同，來觀察清初史臣對夏家故事的理解狀況，以及官方所容許的寫作尺度。

《明史・夏允彝傳》對《明史稿・夏允彝傳》的刪修，有些純粹只是文字的修飾，有些則可能帶有政治的考量。在表三中，筆者將兩篇傳文分成十二個段落來比較，其中第二段、第五段和第七段都完全相同，第一段、第三段只做文字上的修飾；[52]第四段刪「何剛」二字、第十段刪「徐石麒」三字，可能是因為在傳文中並沒有交待他們的生平資料。《明史・夏允彝傳》對《明史稿・夏允彝傳》最重要的修改有三項：第一，去除了原有的評價性文字，如第四段的「名重海內」，第六段「毀家倡義」，以及第十一段對夏允彝道德學問的描述等。第二，《明史》編者似有刻意泯除明末黨派之見的企圖，如刪除第八段、第十一段，刪除第九段中對徐復陽背景的敘述和「時論為不平」數字。第三，《明史》編者只敘述夏氏父子「死亡」的結果，而不及於他們的「死亡」過程。於是，《明史稿》中「慷慨就義」的夏完淳與「從容自縊」的夏之旭，便成沒有事蹟，沒有音聲表情的「死者」了。總之，從《明史稿》到《明史》，〈夏允彝傳〉並沒有像趙翼所說的那樣「事益詳而文益簡」，因為失去情節反而失去動人的能力。

表三：《明史稿》與《明史》〈夏允彝傳〉內容比較表

| | 《明史稿》 | 《明史》 |
|---|---|---|

49 趙翼，《廿二史劄記》（臺北：世界，1983），頁454。

50 王鴻緒等撰，《明史稿列傳》，收入周駿富輯，《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冊97，頁334。

51 《明史》（臺北：鼎文，1975），頁7098~7099。

52 第一段之所以刪去「松江華亭人」五字，是因為同卷〈陳子龍傳〉末段已有「同邑夏允彝」數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 | |
|---|---|---|
| 1 | 夏允彝，字彝仲，松江華亭人。 | 夏允彝，字彝仲。 |
| 2 | 弱冠舉於鄉，好古博學，工屬文。 | 弱冠舉於鄉，好古博學，工屬文。 |
| 3 | 是時東林方講學，蘇州高才生張溥、楊廷樞等慕之，結文會名曰復社。 | 是時東林講席盛，蘇州高才生張溥、楊廷樞等慕之，結文會名復社。 |
| 4 | 允彝與同邑陳子龍、何剛、徐孚遠、王光承輩亦結幾社相應和，名重海內。 | 允彝與同邑陳子龍、徐孚遠、王光承輩亦結幾社相應和。 |
| 5 | 崇禎十年，與子龍同舉進士，授長樂知縣，善決疑獄，他郡邑不能決者，上官多下長樂。居五年，邑大治。吏部尚書鄭三俊舉天下廉能知縣七人，以允彝為首。帝召見，大臣方岳貢等力稱其賢，將特擢，會丁母憂，未及用。 | 崇禎十年，與子龍同舉進士，授長樂知縣，善決疑獄，他郡邑不能決者，上官多下長樂。居五年，邑大治。吏部尚書鄭三俊舉天下廉能知縣七人，以允彝為首。帝召見，大臣方岳貢等力稱其賢，將特擢，會丁母憂，未及用。 |
| 6 | 北都變聞，慟哭累日，毀家倡義，走謁尚書史可法，與謀興復，聞福王已立，乃還。 | 北都變聞，允彝走謁尚書史可法，與謀興復。聞福王立，乃還。 |
| 7 | 其年五月，擢吏部考功司主事。疏請終制，不赴。 | 其年五月，擢吏部考功司主事。疏請終制，不赴。 |
| 8 | 及馬士英、阮大鋮亂政，重允彝名，屢為好辭招之，拒不應，服既除，猶不起。 | 〔全刪〕 |
| 9 | 御史徐復陽者，故逆案中人，至是復官。希要人指，劾允彝及其同官文德翼居喪授職為非制，以兩人皆東林也。兩人實未嘗赴官，無可罪。吏部尚書張捷遽議貶秩調用，時論為不平。 | 御史徐復陽希要人旨，劾允彝及其同官文德翼居喪授職為非制，以兩人皆東林也。兩人實未嘗赴官，無可罪。吏部尚書張捷遽議貶秩調用。 |
| 10 | 未幾，南都失，徬徨山澤間，欲有所為。聞友人徐石麒、侯峒曾、黃淳耀、徐汧等皆死，乃以八月中賦絕命詞，自投深淵以死。 | 未幾，南都失，徬徨山澤間，欲有所為。聞友人侯峒曾、黃淳耀、徐汧等皆死，乃以八月中賦絕命詞，自投深淵以死。 |
| 11 | 允彝學務經世，歷朝制度，暨昭代典章，無所不諳習。獨處一室，志常在天下，名既高，四方人士爭走其門，書問往來，酬荅無暇晷。好獎勵後進，有片善，稱之不容口，多因以成材。與子龍齊名，晚節亦略相似，人謂白首同所歸云。 | 〔全刪〕 |
| 12 | 子完淳，字存古，生有異稟，七歲能詩文，年十三，擬庾信作〈大哀賦〉，文采宏逸。允彝死後二歲，以子龍獄詞連及， | 允彝死後二年，子完淳，兄之旭並以陳子龍獄詞連及，亦死。 |

臺灣大學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 | | |
|---|---|---|
| | 亦逮下吏。談笑自如，作樂府數十闋，臨刑神色不變，年甫十八。允彝兄之旭，字元初，以諸生貢於廷，有聲。南都失，欲與允彝俱死，允彝託以妻子，乃不果，自此不入城市。亦以子龍故，作絕命詞，從容謁文廟，自縊復聖位旁。 | |

清朝官方雖然希望以《明史．夏允彝傳》作為此後傳寫夏家故事的張本，事實上許多傳寫者仍然傾向以情節較豐富的《明史稿》作為改寫的依據，甚至進一步的搜求其他資料，不過在標注參考資料時，則往往只列示《明史》。白堅指出，乾隆《婁縣志．夏允彝傳》與嘉慶《松江府志．夏允彝傳》都有實據《明史稿．夏允彝傳》刪節，而註明是以《明史．夏允彝傳》為底本的情形。[53]筆者也發現，連由清朝中央政府所編訂的《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也有類似的狀況。[54]

如果說從《明史稿》到《明史》，是從事纂修的史臣在政治壓力的影響下，對夏家故事做了高度的壓縮；那麼，從《明史稿．夏允彝傳》到《南疆繹史．夏允彝傳》，則是夏家故事在較不受政治壓力影響的私家修史者手中所得到的解放。

《南疆繹史》的作者是烏程人溫睿臨。他在《明史稿》纂修者萬斯同（1638~1702）的鼓勵下，開始搜集南明史的資料，但他真正動筆，則是萬斯同去世以後的事。[55]《南疆繹史．夏允彝傳》的辭句與《明史稿．夏允彝傳》有很多雷同之處，但對福王政府敗亡後的夏家，做了更詳細的記錄。相對於其他史料中的夏允彝多半呈現謹言慎行的樣貌，溫睿臨筆下的夏允彝，則相當積極的參與復明運動。除了毀家倡義之外，

53 白堅，《夏完淳集箋校》，523。

54 舒赫德、于敏中奉敕撰，《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卷7（臺北：成文，1969年影乾隆四十一年刻本），頁379~380：「中書舍人夏完淳，松江華亭人，吏部主事允彝之子，被執，送江寧，不屈死。」從這段文字明白指出夏完淳的官銜是「中書舍人」，被捕後被押送到「江寧」，可以看出作者據以寫作的史料，實是《明史》與《明史稿》以外的材料。

55 溫睿臨撰、李瑤校，《南疆繹史勘本列傳》，收入周駿富，《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冊104），頁50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更伸展縱橫之術，寫信游說清政府效法金、宋舊事，讓明朝能夠在淮河以南成立新政權；甚至還加入吳志葵的起義軍，「為之飛書走檄，聯絡江、浙士大夫，由是四方響應」。同時，溫睿臨筆下的夏完淳，也不像《明史稿》所記，只是受陳子龍牽連的無辜犧牲者，而是曾經接受魯王官職並拜表慰問的積極復國者。在夏之旭的部份，溫睿臨雖然只用不到四十個字就交代了夏之旭的一生，但透過全文引用《明末忠烈紀實》所收錄的夏之旭絕命詞，不但使夏之旭在夏家故事中的份量，首次超過夏完淳，更使夏之旭的死亡成為動人的忠烈故事。[56]

《南疆繹史》雖然直到道光十年（1830）才由吳郡人李瑤校訂出版，但它對此後的南明史寫作，卻有相當大的影響。以〈夏允彝傳〉來說，凌雪的《南天痕》[57]與徐鼒（1810~1862）的《小腆紀傳》[58]就幾乎全篇襲用溫睿臨的文字。不過，徐鼒在襲用文字之餘，卻做了一項改變，即將夏之旭的傳記提到夏完淳之前，從而改變了夏家故事向來以父子為主軸的敘事架構。

## 六、鄉賢與國殤：夏完淳遺稿的刊刻與流傳

我們之前所看到的夏家故事，大多出自紀傳體的史書。在這些史書中，夏允彝一直居於主體的地位，而夏完淳通常都是以附傳或附見的形式，被放在夏允彝傳的末尾。但在文學的場域裡，夏完淳卻擁有一片屬於自己的天地。

夏完淳的作品最初主要是在江浙地區流傳。根據方授[59]的回憶，他

56 溫睿臨撰、李瑤校，《南疆繹史勘本列傳》，頁665~668。

57 周駿富，《明代傳記叢刊。綜錄類》冊107，頁500~502。

58 周駿富，《明代傳記叢刊。遺逸類》冊69，頁209~211。

59 方授，字子留，生卒年不詳，從他在〈南冠草原序〉中提到夏允彝時稱「瑗公師」，而夏完淳也有〈寄懷子留方二〉一詩，可見他與夏家應有相當密切的交誼。夏完淳，《夏節愍公全集》卷首，頁1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曾經在杭州蔣氏兄弟家裡看到夏完淳的一篇賦、三封信和近千首的詩，[60]不過他自己所收藏的，則只有夏完淳臨終前的作品《南冠草》。順治九年（1652），他到寧波與朋友聚會的時候，談起夏完淳的故事，在座的朋友聽過他的說明之後，都對夏完淳的作品很感興趣，他於是將《南冠草》一書介紹給朋友們欣賞。[61]在清朝最初的一百年當中，夏完淳的作品，就是透過這種傳閱與輾轉抄錄的方式在世間流傳。

夏完淳的作品在清代受到注意，朱彝尊的稱揚應是一個重要的關鍵。[62]他在《靜志居詩話》中，對夏完淳的文學造詣做了相當高的評價：

> 存古南陽知二，江夏無雙。束髮從軍，死為毅魄。其〈大哀〉一賦，足敵蘭成。昔終童未聞善賦，汪踦不見能文，方之古人，殆難其匹。[63]

朱彝尊對夏完淳的評價是從「年少」、「忠烈」與「文采」三方面著眼，他指出，亙古以來，能夠同時具備這三項條件的人，只有夏完淳一個。不過，朱彝尊雖然強調夏完淳殉國的忠烈，但在引錄他的詩句時，卻很小心地避免涉及具有明顯政治意涵的部份。在《明詩綜》中，朱彝尊一共收錄了十一首夏完淳的詩作，分別是〈仿古〉、〈秋懷〉五首、〈精衛〉、〈楊柳怨〉、〈秋夜感懷〉、〈送杜于皇歸郢〉與〈寶帶橋〉。其中〈楊柳怨〉原是一首相當長的七言古詩，詩中對江南社會在國變以

---

60 根據白堅的調查，目前最完整的夏完淳詩文集，也只收錄了312首詩。見《夏完淳集箋校》，〈凡例〉，1~2。

61 夏完淳，《夏節愍公全集》卷首，〈方序〉，頁1a~2a。

62 朱彝尊之所以會注意到夏完淳，可能與他的好朋友李延昰（1628~1697）有關。李延昰是松江府上海縣人，同時也是夏允彝的好朋友徐孚遠的學生。他曾在晚年時以口述方式記錄下許多松江地區士大夫的軼事，後來由華亭縣人蔣烈編訂為《南吳舊話錄》一書。或許是因為交誼的關係，這部書中最常出現的明末人物，就是當時松江的名宿陳繼儒，與夏允彝、夏完淳父子。朱彝尊在〈高士李君塔銘〉中說，李延昰在臨終前將《南吳舊話錄》和歷年所收藏的2500卷書籍一起送給他，雖然我們並不知道李延昰所送的書裡，包不包括夏完淳的作品，但以李氏對夏氏父子的熟稔與推崇，他應該可以成為朱彝尊接觸夏家故事與夏氏父子作品的一條管道。朱彝尊文見趙郡西園老人口述、蔣烈編，《南吳舊話錄》，1067~1069。

63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頁191~192。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的風華與鼎革之後的蕭條，有相當深刻的描寫。[64]但朱彝尊卻只引了最前面的八句，而使它的主題變成單純的訴說離情：

> 東風初度春江曲，大堤花草參差綠。昨宵煙雨盡傷心，今日鶯花空滿目。有客扁舟迴自傷，一江春色半垂楊。始知啼鳥皆牽恨，不是征人亦斷腸。[65]

在朱彝尊所選錄的詩作中，其實也有表現故國之思的詩句，如〈秋夜感懷〉中說：「征鴻非故國，橫笛起新亭」，但這與「束髮從軍」之間的距離，豈能以道里計。朱彝尊對夏完淳詩作的選擇標準，反映出他對清政府言論尺度的認識：表現對已逝明朝的傷感是可以的，但這樣的傷感絕對不可以帶有反映現實乃至於批評、反抗清朝的意味。從這裡我們也可以想見，在這樣的考量之下，夏完淳的作品不可能得到全面性的整理與刊行。

根據後來整理夏完淳詩文的松江人莊師洛回憶，松江地區的書肆，在乾隆初年，已經在賣李雯、宋徵輿、陳子龍三人的合集《雲間三子詩集》。到了乾隆十二、三年（1747~1748）間，松江有個名叫吳光裕的人，開始進行陳子龍遺文的收集刊刻工作，但由於吳光裕去世而沒有完成。[66]從這些現象可以看到，經過將近一百年的沈寂，到了乾隆初年，人們對像陳子龍這樣的抗清運動參與者的忌諱，已經有鬆動的跡象。

乾隆四十年（1775），清高宗正式為明末清初的抗清運動參與者恢復名譽，他在上諭中說：

> 及其他或死守城、或身殞行陣，與夫俘擒駢僇、視死如歸者，爾時王旅徂征，自不得不申法令以明順逆，而事後平情而論，若而人者，皆無愧於疾風勁草，即自盡以全名節，其心亦並可矜憐。雖福王不過倉猝偏安，唐、桂二王並且流離竄跡，已不復成其為國。而諸人

64 夏完淳，《夏節愍公全集》卷4，頁2a~3a。

65 朱彝尊，《靜志居詩話》，頁192。

66 莊師洛，〈陳忠裕公全集跋後識〉；王昶，〈陳忠裕公全集序〉；陳子龍著，施蟄存、馬祖熙標校，《陳子龍詩集》，773~77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茹苦相從，捨生取義，各能忠於所事，亦豈可令其湮沒不彰，自宜稽考史書，一體旌謚。[67]

翌年，清廷頒布《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陳子龍、夏允彝和夏完淳都得到清朝的追謚，他們不再是清朝政府眼中的賊人，而是受到清朝褒揚的忠節之臣；他們對清朝的反抗，不再是叛逆的行為，而成為一種表現忠貞的行動。在這樣的明文宣示下，許多從前只能嚴密收藏、私下欣賞的遺稿，逐漸開始公諸於世。

目前所知最早的夏完淳詩文集刻本，是嘉慶十四年（1809），由王昶（1724~1806）鑒定，莊師洛與弟子陳均、何其偉編輯刊行的《夏節愍全集》。王昶在序文中說，夏完淳的詩文集實際上是整理陳子龍詩文時的副產品。他原先的計畫，本來是想在搜羅陳子龍詩文的過程中，順道收集同為幾社社友的夏允彝的作品，但後來因為沒有什麼收穫，才將目標轉向夏允彝的兒子、陳子龍的弟子——夏完淳。[68]

雖然資料較為豐富是夏完淳詩文的輯校工作得以展開的主要因素，但資料的整理卻不是編者們進行這項工作的主要目的。何其偉在〈書夏節愍集後〉中說：「國朝定鼎容頑民，吾鄉抗節夏與陳」，[69]由此可見，夏允彝與陳子龍在松江地方歷史上的重要性，是編者們之所以願意費心輯校陳夏遺文的重要因素；[70]他們對陳夏遺文的搜羅，其實也是一項輯集地方歷史、凝聚鄉土認同的工作。正因為編者們是從歷史的角度來找尋、觀看夏家的故事，所以他們也和一般史傳一樣，強調夏完淳作為夏允彝之子的角色。於是，夏完淳作品的整理，就在編者們認為「湘

67 舒赫德、于敏中奉敕撰，《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卷首，頁1b。

68 夏完淳，《夏節愍公全集》卷首，〈王序〉，頁1a。

69 夏完淳，《夏節愍公全集》卷末，〈題辭〉，頁344。

70 《夏節愍全集》的四位編者都是松江人，其中莊師洛與陳均是婁縣人，王昶與何其偉則是青浦縣人。婁縣是在順治十二年（1655）從華亭縣分出來的新縣，而位於華亭縣北方的青浦縣，則是陳子龍晚年住居與死後陵墓所在，於是，不管以「府」還是以「縣」為單位，編者們都很容易對陳、夏等人產生「鄉賢」的認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真遺刻在，珍重並尊彝」[71]的需要下展開。

雖然編者們之所以整理夏完淳的作品，是因為夏允彝的緣故，但編者們一旦進入了夏完淳的文學天地，便不得不承認夏完淳的主體性，而開始說一個屬於夏完淳的故事。

在《夏節愍全集》中，編者首先徵引《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追謚夏允彝與夏完淳的記錄，來說明夏氏父子的確是經過清朝政府褒揚的人物。然後以《明史稿。夏允彝傳》來說明夏家故事的梗概。接著編者又引用蔡嗣襄、黃鶴醉翁、《闕氏成仁錄》、《鎮洋縣志》、《紫隄邨志》及《南吳舊話錄》的記載，來描述夏完淳的童年、被捕與起解過程、受審情形及遺孤的下落。其中編者們所謂的《闕氏成仁錄》，就是修改了一些違礙字句後的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夏完淳傳》。雖然屈大均是《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點名批判的人物之一，[72]但編者們還是將屈大均版的夏完淳故事當做認識夏完淳生平的基本架構。

《夏節愍全集》的內容，並不只是單純的收錄、校勘夏完淳的作品，事實上，編者們收集了許多相關的史傳、筆記資料，對夏完淳詩文中所提到的人與事，做了不少註腳。此外，編者們還將他們所收集到的夏家成員的作品與生平資料，以附存的方式收錄在卷末。這些夏家成員，除了夏氏父子和夏之旭以外，也包括夏完淳的女性親屬在內，從而使《夏節愍全集》成為一部以夏完淳為中心的夏家故事總匯。

在完成《夏節愍全集》的輯校工作以後，莊師洛用以下的詩句來總括夏完淳的一生：

> 天荒地老出奇人，報國能捐幼稚身。黃口文章驚老宿，綠衣韜略走謀臣。湖中倡義悲猿鶴，海上輸忠睠鳳麟，至竟雨華埋骨地，方家

71 王昶，〈題夏內史《玉樊堂集》〉，收入夏完淳，《夏節愍全集》卷末，〈題辭〉，頁343。

72 清高宗在乾隆四十年十一月初十日的上諭中說：「至錢謙益之自詡清流，靦顏降附，及金堡、屈大均輩之幸生畏死，詭託緇流，均屬喪心無恥。若輩果能死節，則今日亦當在予旌之列，乃既不能捨生，而猶假語言文字以自圖掩飾其偷生，是必當明斥其進退無據之非，以隱殛其冥漠不靈之魄。」見《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卷首，〈議疏〉，頁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弱弟可同倫。[73]

和朱彝尊一樣，莊師洛也是用「年少」、「忠烈」、「文采」三項指標來為夏完淳做歷史定位，但相對於朱彝尊只能呈現夏完淳的文采，莊師洛則強調夏完淳的忠烈，而且是一種不斷反抗、至死方休的忠烈。

《夏節愍全集》刊刻以後，夏完淳詩文的收藏與閱覽者逐漸不再侷限於江浙地區，[74]到了光緒二十八年（1902），《夏節愍全集》更在數千里外的四川成都重刻刊行。主持其事的舉人吳克讓說，他據以重刊的嘉慶版《夏節愍全集》，是他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時向井研人吳蜀猷所借，而吳蜀猷的書則是他的父親吳祉蕃在擔任順天府房山縣令的時候所取得的。[75]由此我們可以想見《夏節愍全集》在松江刻本刊行後的一百年間所走過的漫長旅程。

我們之前說過，王昶等人輯校刊刻《夏節愍全集》，原本具有表彰鄉賢、收集鄉邦文獻的意義，但當《夏節愍全集》離開了松江，夏完淳就有可能要與其他地區所崇拜的鄉賢有所競爭。在四川重刻本的《夏節愍全集》中由浙江人吳慶坻所寫的序文裡，我們就可以看到這種現象的端倪：

> 慶坻視學蜀中，任滿將歸。新津吳衡騫孝廉持以來，謂將醵貲重刻，而屬為之序。余因念《奇零草》傳本尤罕，吾鄉之人，必有好事如孝廉者。他日歸求其書以寄孝廉，當益有讀之而感發興起者。[76]

引文中所說的《奇零草》，是浙江鄞縣人張煌言（1620~1664）的作品。吳慶坻在序文的後半部份，向讀者介紹「吾浙張公煌言」的生平，並說

---

73 莊師洛，〈輯夏節愍集成題後〉，收入夏完淳，《夏節愍公全集》卷末，〈題辭〉，頁343~344。

74 抄本當然也可以做跨區域的流傳，如山東聊城人傅斯年（1896~1950）說：「憶余八、九歲時，見祖父處有《夏內史集》一薄冊，舊抄本，海源閣物（或協卿先生所遺，不可知也）。」但刻本在傳布上所具有的優勢，卻是不可否認的。傅斯年語見夏完淳《夏節愍全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傅斯年圖書館藏同治乙巳年印本，傅斯年手題記）。

75 夏完淳，《夏節愍公全集》卷末，〈後序〉，頁347。

76 夏完淳，《夏節愍公全集》卷首，〈敘〉，頁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夏完淳之死「與張公略相類」、「《奇零草》傳本尤罕」等等，雖然不見得有引「吾浙張公煌言」與「松江夏完淳」爭高下的意思，但其中所透露出來的鄉邦意識，卻是非常值得加以注意的。

川刻本《夏節愍全集》的刊行，證明吳克讓與他的贊助者們並沒有從地理界域的角度來觀看夏完淳。對這些四川士大夫來說，夏完淳雖然是個「東南」之人，卻是一個值得全天下景仰的忠烈之士。不過，吳克讓所談的忠烈，卻與一百年前莊師洛等人有相當大的差異。相對於莊師洛等人強調不斷反抗、至死方休的忠烈，吳克讓則援用《欽定勝朝殉節諸臣錄》所宣揚的死節觀念，鼓吹「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名教綱常，不可一日不在天下」的忠君觀念。[77]讀到這裡，我們幾乎忘了這已經是新政運動時代的中國。

## 七、少年的浮現：夏家故事的近代版本

綜觀清人對夏完淳的書寫，在朱彝尊所提出的「年少」、「忠烈」與「文采」三項特質當中，「年少」可能是夏完淳身上最明顯，卻最沒有被正面對待的特質。

就筆者閱歷所及，在清代的史傳資料中，以夏完淳為敘事主題的只有兩篇，分別是沈仲方《補東山國語。夏完淳傳》與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夏完淳傳》。這兩位作者雖然都注意到夏完淳的年少，但都沒有直接針對這一項特質多做發揮。

沈仲方說，他之所以寫〈夏完淳傳〉，是因為他與夏完淳曾經有過神秘的接觸經驗：

> 予初未識存古，竟識之夢中，曰：「吾夏存古也」。予感其義，設位為詩以祭之。……後之讀余詩者，既知存古於生前，復感存古於

77 夏完淳，《夏節愍公全集》卷末，〈後序〉，頁3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身後，慎勿以彝仲、臥子諸公附見為嫌也。[78]

沈仲方在描述這次神交的經驗時，並沒有因為夏完淳的年少殉國而感到自慚，反而說自己如果不是因為年輩比夏完淳稍長的話，實在不敢在夢中與忠烈過人的夏完淳論交。（「維子誠少年，乃敢與之伍」）也就是說，沈仲方乃是憑藉自己在長幼秩序上的優位性，來面對在道德實踐上具有優位性的夏完淳。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沈仲方雖然在文章一開始，就以「雲間有少年君子焉」點出夏完淳的「年少」，但「少年」並不是他所要謳歌稱揚的重點，「少年」們更不是他所要訴求的對象。

在《皇明四朝成仁錄。吳江起義傳。夏完淳傳》中，屈大均同樣也注意到夏完淳的「年少」。但相對於沈仲方從「年輩」的角度來認識夏完淳的年少，屈大均則從夏完淳的年少去探討「年壽」的意義。在〈吳江起義傳〉中，除了夏完淳以外，還有另一個少年殉國者——十六歲的呂宣忠，屈大均在卷末的論贊中說：

呂、夏二子，以成童之年，而能慷慨建義，誓死相從，吳公以之不孤，江南因之有氣。何必老成，一殤子勝於彭鏗多矣！[79]

透過呂宣忠、夏完淳的例子，屈大均質疑了中國人的「壽」、「夭」觀念。他強調，生命的意義不在生命的長短，而是在生命存續期間所發放的光芒，透過這樣的論說，屈大均巧妙的避開「年少」在當時的文化脈絡中所可能具有的負面意義。

光緒二十六年（1900），二十八歲的梁啟超（1873~1929）發表了〈少年中國說〉一文，宣示「少年」的觀念即將發生革命性的改變。在這篇文章中，梁啟超將少年等同於進取、冒險與朝氣；而將老年當做幽鬱、悲慘與頹唐的同義詞。正因為少年代表的是無盡的希望，老年則意謂著漸趨滅亡，所以他努力的要在理論上與實際上構作一個「少年」中國。他指出，中國向來只有為一家私產的「朝廷」，而沒有為人民公產的「國家」，因此歷代的興亡更替都只是「朝廷」的生老病死，與「國

78 查繼佐，《東山國語》，頁301。

79 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錄》卷6，頁227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家」沒有任何關係。梁啟超雖然在理論上證明了中國是一個初生的「少年國」，但他強調，倘使中國的國民在心理上不能自覺為「少年中國」的國民，仍繼續讓那些自顧尚且不暇的「老朽之人」主持國家大政，則「西風一夜催人老」，「少年中國」很快的就會瀕於老死的境地。因此，梁啟超大聲疾呼：

> 製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使舉國之少年果為少年也，則吾中國為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景也。使舉國之少年而亦為老大也，則吾中國為過去之國，其澌亡可翹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80]

梁啟超在〈少年中國說〉裡對少年的謳歌與期許，深刻的感動了他的讀者——江蘇吳江人柳亞子（1887~1958）。

光緒二十八年（1902），柳亞子在友人陳去病（1874~1933）的介紹下，開始閱讀梁啟超的作品。也就在這一年，梁啟超陸續發表了〈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意大利建國三傑傳〉、〈匈加利愛國者噶蘇士傳〉、〈張博望、班定遠合傳〉、〈黃帝以後第一偉人趙武靈王傳〉等文章，因而在文化界掀起一波找尋「民族英雄」的熱潮。作為「梁任公的信徒」，當時才十六歲的柳亞子，馬上就加入了這波潮流，並在翌年發表了他的成果——〈鄭成功傳〉。[81]

柳亞子在〈鄭成功傳〉中說，他之所以表彰與崇拜鄭成功，一方面是因為鄭成功是一個能夠「排異種」、「殖新地」的「大政治家」與「大戰爭家」，另一方面則是因為他是一個壯志未酬、身後無名的英雄人物。從柳亞子所表述的英雄形態，我們已經可以察覺梁啟超「宣揚國威」的民族英雄觀念對柳亞子的影響。

然而，柳亞子在〈鄭成功傳〉中所呈現的，並不只是一個「民族英雄」，而且是一個「少年民族英雄」。柳亞子描述，鄭成功原來是個「峨

---

80 鄭振鐸，《晚清文選》（上海：上海書店，1987），461~464。

81 柳棄疾（柳亞子），〈我和南社的關係〉，見氏著，《南社紀略》（臺北：文海出版社，1976），10。丁文江，《梁任公年譜》（臺北：世界書局，1959），172。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冠彩服、颯爽英姿、年少翩翩」的「絕代佳公子」，「以二十三齡之少年，一躍而樹獨立之旗于南濘」，在此後的西征東討過程中，雖然沒有完成驅逐異族的宿願，卻在海外建立了一個「漢種最後之居留地」——臺灣。

「少年」精神與「民族英雄」觀念，在梁啟超原先的論說當中並沒有必然的連繫，然而透過柳亞子的再創造，這兩項觀念卻有了緊密的連結。不過，柳亞子雖然想將鄭成功塑造為「少年民族英雄」的代表，即使鄭成功的確曾經是一個「少年」，他卻不會永遠是個「少年」。尤其在十六歲的柳亞子想像中，去世時才三十九歲的鄭成功，已經是個「攬鏡華髮、據鞍髀肉」的「老」將軍了。[82]於是，可想而知的，少年柳亞子必須另外去找尋他的「少年民族英雄」。

光緒二十九年（1903），柳亞子在閱讀自己家裡所收藏的《南疆逸史》與《海甸野史》時，終於找到了一個永遠的「少年民族英雄」，那就是永遠停留在十七歲的夏完淳。柳亞子隨即寫下此生第一篇夏家的故事——〈夏內史傳略〉。[83]根據光緒三十二年（1906）在光復會機關報《復報》上發表的版本來看，柳亞子所說的夏完淳故事其實就是屈大均版的夏完淳故事，但柳亞子在說這個故事的時候，卻不像屈大均那樣以譏刺偷生的遺老們為目的。他在傳末的論贊中說：

> 明政不綱，漢祚以斬。南東志士，抱種族之戚，揚旗擊鼓，問鼎中原，大事不成，九死靡悔，前仆後起，輝映史策者，比比皆然。然求其少年立節如夏內史者，殆無幾也。……三百年來，大仇未報，內史有靈，安能瞑目！九峰、三泖間不泛〔乏？〕英英露爽之少年，其有第二之夏內史出現於光復軍中，以竟前哲未遂之遺志者乎！則內史為不死矣。[84]

透過強調夏完淳「少年立節」的卓越性，以及明末抗清運動的種族意涵，

82 亞盧（柳亞子），〈鄭成功傳〉，《江蘇》4期（1903，東京），61~64。

83 柳無忌，《柳亞子年譜》（北京：中國社會科學，1983），13~17。

84 白堅，《夏完淳集箋校》，5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柳亞子明確的指出「少年」在「種族革命」中的能動性。但柳亞子並不只是以讀者的年齡為訴求，從他特別期待「九峰」、「三泖」（即蘇、松地區）的少年們能夠繼承前人未盡之志，就可以看出鄉賢崇拜也是他在進行革命動員時的一項重要工具。

在光緒三十二年（1906）的上海，還有另外一個媒體正在傳播著夏家的故事，那就是由國學保存會所發行的《國粹學報》。國學保存會是由廣東順德人鄧實（1876~？）所創辦的社團，由於會員大多具有革命黨員身份，因此論者常將它視為清末革命團體的一員。[85]國學保存會的一項重要業務，就是搜羅與刊布舊籍，而明末殉節士大夫與明遺民的著述尤其是他們搜羅的重點，[86]因此，《國粹學報》上的夏家故事，也以文獻的刊布為主要形式。

雖然柳亞子也是國學保存會的會員，且常在《國粹學報》上發表詩文，他卻幾乎沒有參與《國粹學報》裡的夏家故事書寫活動。《國粹學報》中最重要的一個夏家文獻刊布者，非陳去病莫屬。陳去病是柳亞子的同鄉好友，在他書寫夏家的過程中，似乎也一直和柳亞子在資料上互通有無，不過他對夏家的書寫重點，卻與柳亞子有相當大的差異。[87]

相對於柳亞子特別強調夏完淳作為史上唯一一位少年民族英雄的地位，陳去病則將夏氏父子看作眾多鄉里先賢中的二員，因此他對夏家文獻的整理，實際上也是對鄉邦文獻的整理。當然，身為革命派人士的陳去病之所以整理鄉邦文獻，已不像王昶等人一樣，只是在凝聚一種鄉土的認同，而是要藉著重建鄉人反抗清朝政府的歷史，強化鄉土與中央間的衝突以及種族之間的矛盾，藉此達到革命動員的目的。

陳去病對夏家文獻的整理，是從夏完淳詩文集的重編工作開始，這項工作在光緒三十一年（1905）時似乎已經告一段落。雖然陳去病對夏

---

85 鄭師渠，〈簡論晚清國粹派的崛起〉，收入胡偉希，《辛亥革命與中國近代思想文化》（北京：中國人民大學，1991），5~7。

86 〈國學保存會簡章〉，《國粹學報》13期（1906，上海），〈敘〉，1b。

87 陳去病，〈夏瑗公侯納言傳跋〉，《國粹學報》3年7號（1907），〈撰錄〉，3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完淳的作品有相當高的評價，但他卻不像柳亞子那樣對夏完淳深刻著迷。[88]於是，從光緒三十二年（1906）起，陳去病對夏家故事的關懷，逐漸轉移到遺文大多亡佚的夏允彝身上。[89]在陳去病與其他《國粹學報》撰文者的努力下，夏允彝的傳記、軼事與作品逐漸重現，而侯玄涵的〈吏部夏瑗公傳〉也就在這個時候公諸於世。

《國粹學報》對夏家故事的書寫，在光緒三十三年（1907）以後逐漸式微。到了民國時期，在重要的報刊上，大約有二十多年的時間，幾乎沒有人再提起夏家的故事。這一方面是因為夏家的文獻經過莊師洛與陳去病等人的搜羅，已經發掘殆盡；另一方面則是因為在追求「新文化」的呼聲當中，南明的歷史已經成為邊緣的課題。但夏家的故事並沒有被遺忘，它存留在書籍裡，存留在許多晚清少年們的腦海裡，等待著重新發聲的機會。

夏家故事的重現，與日本對華侵略的加劇有密切的關係，而抗戰的爆發與政府的西遷，更促使人們將現實與明清之際的歷史連結在一起。一九三八年，在晚清時曾經手抄夏完淳集的汪辟疆（1887~1966），在友人的催促下，用了一個晚上的時間寫成〈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戰的民族文藝家——夏完淳〉。根據汪氏的回憶，這篇文章在重慶刊出以後，曾在各地報刊上轉載了四、五十次，風靡程度可見一斑。[90]

汪辟疆的文章雖然寫得很倉促，但卻做了一項劃時代的改變。在莊師洛所編輯的《夏節愍全集》中，雖然已經開始收集夏完淳的嫡母、生母、姐妹、妻女的資料，但夏家女性成員大抵只有兩種面貌：一是撫孤守節的節婦，一是雅擅詞藻的閨媛。而汪辟疆對夏家婦女的介紹卻是：「他〔完淳〕的母親姊妹和他的夫人，皆是平日談忠談孝的婦女，及國

88 陳去病在〈敬觀夏彝仲考功遺札〉一詩中說：「內史文章日月縣〔懸〕，南冠一草正重編。（時予正編定令嗣《內史全集》）」，見《國粹學報》1年6號（1905），〈文篇〉，10a。

89 陳去病對夏允彝的重視，可能還有另外一個因素，即對幾社、復社歷史的緬懷。關於此點，可參看鄭勇，〈社會轉型中的文人結社——以南社研究為中心〉，《學人》11輯（1997，江蘇），472~477。

90 白堅，《夏完淳集箋校》，722~7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破家亡，都截髮為尼。」、「到了順治四年的五月二十五日，他〔之旭〕一人走入文廟，自縊於顏子的神位旁邊。這時允彝的妻妾，已截髮為尼。他的兩位小姐，早已遁入空門，去過她們的寂靜生活。」[91]透過構作集體截髮的歷史圖象，汪辟疆向讀者證明夏家女性對清朝政府的抗議，從而證明夏家女性對國家事務的關懷，使她們成為「天下興亡，匹婦有責」論的先行者。

一九四〇年，當時寓居上海孤島的柳亞子，重新展開書寫夏家的活動，先後寫成〈夏允彝、完淳父子合傳〉與〈江左少年夏完淳傳〉兩篇文章，分別在上海與香港的刊物上發表，其中以語體文寫作的〈江左少年夏完淳傳〉，尤其是一篇廣為轉載的作品。在此同時，蘇雪林也在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委託下，寫作《南明忠烈傳》一書，以表彰明末「幾百個」忠臣義士，而夏氏父子自然也名列其中。

雖然汪辟疆、柳亞子、蘇雪林等人所寫的夏完淳故事，基本上都是屈大均版的故事，是年輕、文采橫溢的夏完淳投筆從戎、壯烈殉國的故事。但即使是柳亞子，他也不再像四十年前那樣，期待英英露爽的少年們起事革命了。而首先發難的汪辟疆，雖然用了「青年抗戰」的聳動標題，但他的寫作重點主要在呈現作為一個「民族文藝家」的夏完淳。從汪氏在川刻本《夏節愍全集》上的題記，我們可以更清楚的看到汪氏的心態：

> 世亂方殷，東禍益亟，國人慷慨赴敵，不亞有明，然弱冠從軍，文章秀出如存古者，尚不可得，重誦此集，又不勝人才消長之思也。[92]

至於為國民黨中宣部發言的蘇雪林，之所以要書寫明末忠烈人物，主要就是為了表彰他們的「含辛茹苦，終無怨言，竭忠盡智，惟期活國」，藉此批評那些附從汪精衛政府與延安政府的文人「昧於中國歷史教訓」。但蘇雪林即使對參與抗戰的軍人有相當高的評價，她並沒有鼓動

91 汪辟疆，〈三百年前一位青年抗戰的民族文藝家——夏完淳〉，《學粹》11卷1期（1968，臺北），12~13。

92 白堅，《夏完淳集箋校》，66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青年從軍，只希望青年們「毅然走到那些文武合一的教育機關裡去」，不要成為「殺身無補」的「無用文人」。[93]總而言之，這些作品雖然表彰了一個投筆從戎的歷史人物，卻沒有鼓勵投筆從戎的行為，即使加強了愛國的情緒，卻沒有指出任何具體的行動方針。

這樣的愛國宣傳，一直到一九四三年才有所改變。這一年的三月十日，蔣中正的《中國之命運》正式發行，三月二十九日，三民主義青年團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國民黨對青年的愛國宣傳，終於有了較具體的行動方案。《中央日報》在三月三十日以「青年之路」為題的社論中，要求青年承擔責任、接受紀律、學習國防技術科學、參與國防經濟建設，希望青年們能夠像蔣中正在《中國之命運》裡所說的，立志做中小學教師、飛行員、鄉社自治員、屯墾員、工程師。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九日，《大公報》上又刊出了一篇夏完淳故事——〈明代模範學生——夏完淳，獻與於第三次大團結的青年〉，作者聞亦博[94]在結尾中告訴讀者：「惟今日之事，報國途徑甚多，正不必皆效完淳所為，從事於實際直接之戰鬥工作。」他認為讀者們應該效法的是夏完淳「以身許國」的精神，而不是「投筆從戎」的行為，青年應該根據《中國之命運》的「指示」，投入開發、建設的工作。從作者將夏完淳定位為一個「模範學生」而不是「模範青年」，我們可以看出作者所要訴求的對象，其實不是全部的「青年」，而是「青年學生」。此外，從作者在文章中特別要與「投筆從戎」說進行對話，可以想見「投筆從戎」的想法在當時青年學生族群中盛行的程度，但他們在當時的徵兵法當中，卻是可以豁免兵役的一群。

早在抗戰之初，國民政府的徵兵政策就已經引起許多地方民眾的反感，避役、逃役的情形相當嚴重，[95]而想要「投筆從戎」的青年學生，

93 蘇雪林，《南明忠烈傳》（臺北：商務，1969），〈原序〉，5。

94 胡適在《獨立評論》107號（1934，北京）的編輯後記中說：「聞亦博先生……是在北平協和醫學校做研究工作的。」

95 王篤生，〈無限期望中的傷感與彷徨〉，《抗戰》53期（1938，上海），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卻又有無處請纓的抱怨。相形之下，左翼人士所組織的服務隊、宣傳隊與「青年軍團」，則能夠較有效的將這股可用的民氣組織起來，並從實踐中摸索可行的運用方式。[96]從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知識青年從軍運動展開後的盛況，我們便可以想見，國民政府在之前的六年當中所失去的青年資源。

在抗戰時期，夏家的故事除了以文字的方式傳播以外，也以戲劇的方式傳播。在一九四三年前後，坊間至少出現了三部以夏完淳為主角的劇本，其中最知名的，應是郭沫若的《南冠草》（演出時更名為《金風剪玉衣》）。[97]這齣戲的故事主線，是夏完淳被捕、押解、受審、殉難的經過，副線則是夏完淳、王聚星與盛蘊貞之間的三角戀愛關係。這樣一部以年輕人為主要角色的劇本，吸引了一支「青年」劇團的注意，那就是附屬於三民主義青年團的「中國青年劇社」。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中旬，這齣戲在沒有什麼廣告宣傳的情況下開演，[98]並創造了不錯的票房，一共連演了二十七場。[99]劇作家陽翰笙在看了這齣戲以後表示：「深覺此劇在演出上很失敗，特別是〔馬〕彥祥飾演的夏完淳。也許是因為他病勞過度的關係，毫沒有一點青年人的靈氣。」[100]在主角的表演不盡理想的情況下，何以這齣戲仍然可以吸引不少觀眾進入劇場？由於缺乏觀

96 鄧南築，〈關於抗敵青年軍團〉，《抗戰》52期（1938），8。

97 在郭沫若寫這個劇本之前，已經有人寫了一個名為《夏完淳》的劇本；而在郭沫若的劇本發表之後，張燾朗又根據柳亞子的意思，另外寫了一部名為《江左少年》劇本。郭沫若，〈夏完淳〉，收入郭沫若，《郭沫若劇作全集》第2卷（北京：中國戲劇，1982），543；白堅，《夏完淳集箋校》，757~758。

98 《金風剪玉衣》只在1943年11月13日、15日的《中央日報》上登了兩天的廣告，《大公報》則刊載了兩則演出訊息，《新華日報》的副刊因為設有戲劇專頁，所以做了較積極的宣傳。除了刊載演出訊息之外，還在11月1日刊出金梓凡的〈讀「金風剪玉衣」〉，向讀者介紹這齣戲的劇情。11月15日，又刊出郭沫若的〈《南冠草》日記〉，說明該劇的寫作過程。相較於與它約略同時演出的《野玫瑰》一劇，幾乎天天在《中央日報》與《大公報》上大登廣告，實有天壤之別。

99 王大敏，《郭沫若史劇論》（武漢：武漢，1992），122。

100 龔繼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譜》中冊（天津：天津人民，1992），56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眾回應的史料，我們只能從演出單位如何吸引觀眾入場的角度來探索這個問題。在十一月十三日《中央日報》第四版的廣告上，除了列出演職員名單、演出時間、票價之外，並標明是重慶衛戍總部為籌募衛戍區子弟學校基金而請該劇團演出。到了十一月十五日，贊助單位已經變成了「重慶市警察局流浪兒童教養所」，贊助單位的變動，雖然可能反映了贊助者的能力薄弱，但不同贊助者所具有的不同人脈關係，也許可以讓更多的觀眾走進劇場（不管他們是否付費）。在十一月十五日的廣告上，也對劇情做了簡單介紹：「以十七歲神童寫下了民族的史詩，在廣大中原建立了祖國的光榮。」我們不知道這樣的宣傳詞是不是真的具有影響力，但可以確定的是，廣告製作者認為這段宣傳詞是有宣傳效用的，從而可以推知，「金風剪玉衣」是一個為青年們而演出的作品。

時人對郭沫若的歷史劇作品，常有「歪曲歷史」的批評，[101]在《南冠草》一劇中，郭沫若所安排的三角戀情關係，就使柳亞子相當不滿意，因此才授意張瀟朗另外寫一個劇本。對於觀眾們希望他「傳達歷史真實」的要求，郭沫若一方面否定所謂「歷史真實」的存在：「歷史並非絕對真實，實多舞文弄墨，顛倒是非」；另一方面則為自己辯護：「史劇家在創造劇本，並沒有創造『歷史』，誰要你把它當成歷史呢？」[102]誠然就像郭沫若所預期的，歷史劇觀眾的確可以意識到歷史劇與歷史之間的差距，因此郭沫若在《南冠草》一劇中所創造的戲劇效果，實際上並沒有被納入後來的夏完淳故事中。不過，人們雖然沒有接受郭沫若在歷史劇中對「史實」的「歪曲」；但對於郭沫若在附錄的考訂資料中「舞文弄墨」卻幾乎是沒有什麼戒心，因此使夏完淳有意投靠李自成、張獻忠的說法，成為廣為流傳的故事。[103]

郭沫若在一九四八年所寫的〈少年愛國詩人夏完淳〉一文中說，夏

101 如凡民，〈看「清宮外史」演出〉，《中央日報》，1943 年 3 月 24 日，6 版。

102 郭沫若，〈歷史・史劇・現實〉，《郭沫若選集》（北京：人民，1997），427、429~430。

103 白堅，《夏完淳集箋校》，15~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完淳的事蹟在抗戰時期的大後方，是廣為人知的故事，[104]但戰時的夏完淳書寫活動，究竟對時人發生了什麼影響，在史料闕略的情況下，這實在是一個幾乎無法回答的問題。在此，筆者只能嘗試用一個個案來結束這段討論。現今最主要的一位夏完淳故事書寫者，同時也是《夏完淳集》的箋校者白堅，在〈蕩灣謁夏墓為夏內史完淳作〉一詩中自注：「余十四齡，即瓣香完淳，歷十九年，始得赴松江訪其遺跡」，而根據白堅為陳子龍〈會葬夏瑗公〉詩所作的案語，他是在一九六二年初到松江去訪察夏氏父子遺跡的，[105]反推十九年，就是一九四三年，於是證明這位以半生之力箋校夏完淳詩文的學者，正是受抗戰時期夏完淳故事書寫活動影響的一個例證。

如果我們將夏完淳故事的書寫活動分成三個段落，則王昶、莊師洛可以說是第一代的代表，他們的貢獻主要表現在對遺文、傳記文獻的收集。第二代的代表則是柳亞子、汪辟疆與郭沫若；這三位「夏完淳迷」以第一代的成果為基礎，將夏完淳的故事大眾化與普及化，從而引領第三代的白堅進入夏家故事的領域。相對於第二代的「夏完淳迷」在夏完淳的故事上做了許多「踵事增華」的動作，第三代的「夏完淳迷」白堅，則從事長期的考訂與箋校工作，試圖還夏完淳一個「本來面目」。

## 八、結論

夏允彝的兄長夏之旭在絕命辭中說：

> 新朝之所謂叛，乃故國之所謂忠，夫何傷哉！余讀聖賢書，今死聖賢地，夫亦死於聖賢之教，非死於新朝之法也。[106]

在新舊政權交替的時代，新政權不但取得了統治權，也取得了詮釋權。

---

104 白堅，《夏完淳集箋校》，608。

105 白堅，《夏完淳集箋校》，767、771。

106 夏完淳，《夏節愍全集》卷末，〈附存〉，頁3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新政權一方面運用統治權來收編或肅清舊政權的附從者，另一方面則運用詮釋權將舊政權附從者污名化。這種統治權與詮釋權轉移所造成的價值錯亂，可以說是明清之際士人最困擾的一個問題，生死、出處等諸多抉擇，都因為這種價值錯亂而變得更加的困難。

夏之旭的自縊孔廟，徹底否定了政權對「忠」這項道德的詮釋權，對他來說，「忠」作為一種「聖賢之教」，乃是一種絕對性的道德價值。至於「法」對這種道德實踐的界定與詮釋，則是暫時性的、相對性的，透過這樣的認識，夏之旭將自己的死亡，從枉法提高到殉道的層次。

在確立了「忠」的價值之後，另一個棘手的問題就是「忠」的內涵。對陳子龍、侯玄涵來說，「不事二姓」是「忠」的基本原則，而夏允彝就為了踐履這項原則，付出生命的代價。但對屈大均而言，「忠」的實踐除了「不事二姓」之外，還要「一再起義」。因此在夏氏父子的故事形成過程中，隨著「忠烈」形象的確立，「反抗」的行動也越來越成為忠烈書寫的主要內容。到了清末，因為革命運動與國族主義的勃興，「忠烈」故事中的「反抗」主題又更加的強化。

夏氏父子出身平凡、仕宦不顯，他們的「忠烈」事蹟也不是最「艱苦卓絕」、最「慘烈」的個案，但他們的故事之所以能夠從明末眾多忠烈故事中脫穎而出，主要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夏氏父子是松江府人，這個地區在從明清之際的兵燹中復甦之後，一直居於全國經濟與文化的中心地位，這使當地的士人有能力營造鄉賢的崇拜，並透過文獻的彙集與刊刻，向外推廣他們的鄉賢。第二，清末以降，「少年」與「青年」族群的興起，使夏完淳的「年少殉國」成為比其他忠烈人物更加卓越的特質，從而使他成為一位可以被單獨表彰的明末忠烈人物。

近幾年來，臺灣學界做了許多解構偶像、神話的研究，從清代臺灣的吳鳳、日治臺灣的莎韻（Sayun Hayun），[107]上古中國的黃帝與近世

107 溫浩邦，〈歷史的流變與多聲：「義人吳鳳」與「莎韻之鐘」的人類學分析〉（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96）。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中國的諸多「民族英雄」，[108]乃至於當代中國的「太原五百完人」[109]與韓戰時期來臺的一萬四千名「反共義士」，[110]一個又一個已經被遺忘的神話與偶像，[111]都在歷史學者的研究中重新土崩瓦解。這批新「古史辨」運動的參與者大多認為，歷史可以被擁有權力的人自由的操作與塑造出他們所想要呈現的樣貌。但從夏氏父子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看到，操弄歷史並不如想像當中那樣自由。即使在異傳紛呈的清代初期，夏允彝的故事也一直保持著相當高的一致性，而夏完淳的故事雖然一直存在著若干異說，可是在《夏節愍全集》出現以後，即使是想要將夏完淳塑造成人民英雄的郭沫若，也要依傍夏完淳的詩文來得出他所想要的樣貌，但這樣一來，白堅就同樣可以透過閱讀夏完淳的詩文來指出郭沫若的破綻。當然，每一個時代的歷史研究者，都有他們自身或時代的盲點，因此，當他們在說別人的故事的時候，其實也正在記錄著自己的故事，而歷史研究的一項樂趣，也許就是在辨析不同時代的故事的過程中，發現自己的故事。

*本文曾於2000年5月26日在「兩岸三地研究生視野下的近代中國學術座談會」中宣讀，承蒙與會學者指教，謹此致謝。

（責任編輯：洪麗完　校對：劉嵐崧）

108 沈松僑，〈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8期（1997，臺北），1~77；沈松僑，〈振大漢之天聲——民族英雄系譜與晚清的國族想像〉。

109 張世瑛，〈太原五百完人：一段國共戰爭歷史的想像與塑造〉（「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會議論文，1999）。

110 黃克武，〈一二三自由日：一個反共神話的興衰〉（「一九四九年：中國的關鍵年代」學術討論會會議論文，1999）。

111 在臺灣大學教授大一「臺灣史」課程的許佩賢小姐曾經告訴筆者，有一次她在課堂上問學生：「你們知不知道吳鳳是誰？」全班學生幾乎是一臉茫然，她接著問：「你們知道吳鳳後來怎麼了？」在一片靜默之後，被老師點名回答問題的學生所說出的答案是：「吳鳳後來死掉了。」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Making the Martyrology of Two Late-Ming Loyalists: Hsia Yun-i and Hsia Wan-ch'un

Sun, Huei-min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Abstract

Hsia Yun-i (1596~1645) and Hsia Wan-ch'un (1631~1647) were father and son, both of them died because of taking part in the anti-Ch'ing movement in Sung-chang. Although they were not the most famous martyrs in the beginning, they became figures adored by the local literati at first, and then gained national-wide fame because of the efforts of their younger countrymen.

During Late-Ch'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the rising "youngsters" began to praise the youngest martyr Hsia Wan-ch'un. In the new martyrology of Hsia family, the son, but not the father, became the main character.

**Keywords:** Hsia Yun-i, Hsia Wan-ch'un, loyalism, Ming-ch'ing transiti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